

(学会内部交流, 非卖品)

胡适研究通讯

2009年第2期(总第6期)



胡适研究会编

2009年5月25日

目 录

五四新文化：继承与超越·····	耿云志（1）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总结发言·····	耿云志（8）
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成立 20 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	耿云志（10）
陈独秀：我们如何表达·····	孙 郁（12）
胡适研究会十七年来的工作·····	宋广波（20）
我的“胡适阅读史”：被阉割的“五四火种”在台湾 ——《容忍与自由：胡适思想精选·编辑后记》·····	潘光哲（22）
再现胡适（附耿云志复六小龄童函）·····	六小龄童（25）
张佛泉先生笔名考·····	张洪彬（28）
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智效民（32）
澄衷学堂时期胡适所受的公民训练·····	张书克（37）
2007 年胡适研究论文索引·····	宋广波（41）
简讯三则·····	宋广波等（49）

五四新文化：继承与超越

耿云志

近数十年来，围绕着如何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者，多从肯定方面加以研究，加以论述。有人或许以为他们不承认新文化运动有其负面的影响。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者，自然是从否定的方面加以研究，加以论述。人们认为他们完全否认新文化运动的正面意义。

上世纪晚期以来，有人提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应当在继承的基础上超越。这无疑是一个很不错的提法。但问题是在于如何继承？如何超越？

若论到如何继承，首先要明确继承什么。我想，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应当是科学与民主。当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分子们，都把这两者看成是当时的中国最需要的东西。

—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中国从戊戌维新运动起，先觉分子就追求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替代固有的君主专制制度。不过，清末的革命家和改革家们心目中的民主制度，只是一套政治安排，一套政治架构。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议会的组织，以为有了议会，就有了民主制度。革命党人对此坚信不疑。立宪派的梁启超略有些迟疑。他觉得，以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国民素质，恐未必能运用好议会这种组织。民国成立后，有了议会；但议员们既没有阻止袁世凯复辟帝制，也没有避免使自己堕落为“猪仔”议员，他们竟以自己神圣的投票权换取五千大洋去吃喝玩乐。于是人们对民主制度失望，有的转而倾向复旧，有的向往各种各样的乌托邦。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们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能看出问题之所在，而不像一般人那样在挫折和混乱面前迷失方向。他们认识到，民主制度之未能落实，是因为国民没有民主的观念。要国民树立民主的观念，就得让他们明白，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堂堂的独立的，享有不可让渡的自由权利的个人。陈独秀所谓“吾人最后之觉悟”，必须是每个人“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¹亦即“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

¹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07页，三联书店，1984年。

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²。胡适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³就是说，要建立民主制度，使国家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那么，国人就必须摆脱奴隶地位，去掉奴隶思想，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享有自由权利的个人。显然，他的意思与陈独秀所说的是完全一致的。

正因如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当时极力提倡个性主义，极力主张个人的独立与解放。提倡个性，个人自由，在清末已有人讲过，如梁启超（见其《新民说》等），如鲁迅（见其《文化偏至论》等）等。然而，第一，那时人们没有对个性、个人自由等等给出清晰而圆满的界定。第二，那时没有把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之间的关系讲清楚，往往陷于不易摆脱的困惑之中。第三，那时，也没有人把个性与个人自由同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讲清楚。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们，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有新的建树。例如，关于个性与个人自由的界定，他们指出，个性主义“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⁴从前，严复、梁启超们只是说个人自由，但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界。这是从消极方面来界定个人自由。现在强调个人要对自己出之于自由意志的言论、行为承担完全的责任。这是从积极方面，更加客观，也更加深刻地揭示出自由的完整的意义。而且针对中国的国情与民众心理，这样讲，就澄清了专制主义者对自由的曲解和污蔑，也解除了一些好心人对自由的种种担心和误解。久处专制主义桎梏之下的人们常常误以为，个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人欲横流。实则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个人，既然是独立自主的，有自由意志的，那就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如果你危害到公共利益，或侵犯了他人的自由，你就必须接受惩罚。这既是维护每个个人的自由所需要的，也是维护公共社会利益所必需的。

再如，关于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们也给出了非常明晰的解答。他们指出，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个人的人格，就是为国家争人格。⁵这听起来或许不足以说服人。但仔细论起来，其间的道理也并不神秘。每个为国家民族的自由而慷慨赴义的人，都是首先感受到自身的不自由的痛苦或亲历到自己亲人的不幸，当他们走上斗争的前线的时候，他们所意会到的，自己的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还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学唱过一首挽歌，其歌词说：“感受不自由，莫大的痛苦；在我们遭受灾难的时候，你们英勇，你们英勇地抛弃了头颅。”我觉得，这个简短的歌词，生动地透显出，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之间的紧密的关系。

² 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4页，三联书店1984年。

³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635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

⁴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存》卷四第35页，亚东图书馆1925年第8版。

⁵ 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635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

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国家自由，民族自由，必须建立在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陈独秀说：“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利益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⁶著名政治学家、《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高一涵更明确地指出：“国家为人而设，非人为国家而生。离外国家尚得为人类，离外人类则无所谓国家。人民，主也；国家，业也。所业之事，焉有不为所主者凭借利用之理？”⁷

从以上的论述就可明白，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的心目中，个性主义，个人自由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他们看来，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实在是民主制度的灵魂。若没有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民主便只是一句口号，只是一套空架子。只有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得到真实而充分的保障，民主政治才能落到实处。

继承五四，当然要继承五四的民主精神。五四时期，先觉者们所讲的民主，还只能是世界上已有的，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的西方民主制度，或如人们习惯地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这种民主，是指出它有其虚伪的一面。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的奴隶制，工人们被束缚在现代企业的严格管理之下，流血流汗，仅仅为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已。他们不可能享受到民主制度的充分保障。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要使民主制度变得更真实，更普遍。我们要超越五四，就应该努力建设一种真实的普遍的民主制度。

二

科学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们所最关注的另一主题。

批评或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学者，自然本身并不反对科学。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批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不懂科学，因此不配谈论科学；二是批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迷信科学，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们把这称之为“科学主义”。

应该承认，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其本身确都不是科学家，如果让他们直接对中国的科学作出绝大贡献，那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研究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们，从来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讨论五四的科学提倡者们的。我们一直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当时所关注的，所强调的，是希望中国人养成尊重科学的态度，树立起依照科学办事的精神，了解最基本的科学方法。简言之，就是提倡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当然，他们这样提倡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自然也饱含着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的期待。

⁶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98页，三联书店1984年。

⁷ 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青年》1卷4号。

我们看看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们是怎么说的。

我们知道，陈独秀在《青年》创刊号上即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的主张。那么他对科学是怎样了解的呢？陈独秀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⁸为了使人们对科学有更清楚的了解，他拿科学与想象相对照。他说：“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⁹两相对照即可明白，陈独秀所说的科学不是指某一种具体的科学，不是某一项科学定理或某一项科学发现与发明，而是指最基本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他强调，科学是运用理性，从客观实际中得出的真理。他指出，只有这种从客观实际中得出的真理性的知识，能够帮助人们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种种实际问题。可惜，由于我们中国人常常不注重科学，往往迷信阴阳五行、风水符瑞之类，以致农、工、商、医等皆不能充分发达。他说：“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¹⁰在陈独秀看来，科学既是获取真理性知识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和途径，同时也是帮助人们祛除迷信的可靠方法。陈独秀丝毫不怀疑科学的普遍性意义。清末以来中国人在介绍西方科学的时候，带有严重的偏狭的心理，以为只有自然科学是科学，换言之，科学只有在研究自然现象时才可派上用场。陈独秀批评道：“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自然科学外没（还）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所以他强调：“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括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¹¹

承认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意义，这是凡多少受过现代科学与学术训练的人们的共识。胡适在他提倡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大量文章和讲演中，强调得最多的就是这一层意思。他说：“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¹²这其中除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句话，尚须推敲之外，所说都是对的。他认为这种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不但是做一切学问都适用，而且对于做人处事也是适用的。他在说过上述那段话之后，紧接着就说道：“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

⁸ 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7页，三联书店1984年。

⁹ 同上。

¹⁰ 同上，第78页。

¹¹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程度修文章选编》（上）第512页，三联书店1984年。

¹²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645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

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¹³

批评“科学主义”的人们，否定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有普遍意义。他们以为，陈、胡等人，因为其本身不是科学家，所以，对科学有误解，把科学方法过于泛化了。他们主张，要把科学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许它干预自然以外的事物。

让我们再看看真正的自然科学家们是怎么看的。

著名的化学家、中国最早的科学社团——科学社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任鸿隽在《科学》月刊上撰文说：“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真理之为物，无不在也。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实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无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又不特无容心已也，苟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¹⁴他认为这种科学精神是适用于一切学问和人生各领域的。他说：“科学的精神是求真理，真理的作用是要引导人类向美善方面行去。我们可以说，科学在人生态度的影响，是事事求一个合理的。这用理性来发明自然的秘奥，来领导人生的行为，来规定人类的关系，是近世文化的特采，也是科学的最大的贡献与价值。”¹⁵

从上面所引当时倡导新文化的领袖和科学家们对科学的理解，我们可以总结起来说，科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求得真理，并据以规范自己行为的理论与方法的总称，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实事求是。这样理解的科学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基于对人类认识能力的信仰。20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爱因斯坦说：“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¹⁶那些批评所谓“科学主义”的人们，显然是要给科学，要给人类的认识能力规定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要为各种神秘主义、信仰主义留下充分的空间。我个人认为，科学和人类的认识能力，在现实中，是有局限的，但在未来的发展上，应该是无尽的。有谁能够证明给我们，说科学到达某一处地方，就必定要停止下来呢？

五四时期提倡科学的人们，不过是表达了他们对于科学的发展，对于人类的认识能力的充分信仰而已。这没有什么错。今天不但不应反对科学，不应限制科学的发展，而且仍应大力提倡科学，以抵制各种迷信的回潮。

¹³ 同上。

¹⁴ 任鸿隽：《科学精神论》原载《科学》2卷1期，转引自樊洪业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70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

¹⁵ 任鸿隽：《科学与近世文化》，原载《科学》7卷7期，转引自樊洪业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280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

¹⁶ 爱因斯坦：《论科学》，引自许良英、王瑞智编《走近爱因斯坦》第14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

三

我个人认为，在五四那个时代，人们抓住民主和科学两个主要观念灌输给广大的人群是很有道理的。他们确是当时最迫切需要的。不过，我以为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认识，似乎可以深入到更基本的层次。我在1994年第一次提出，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有两个最基本的趋向：一个是世界化，一个是个性主义。世界化就是对外坚持开放；个性主义就是对内坚持以解放个人为核心的改革。我觉得，这可能会抓住比较更为根本的东西。2004年，我在《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重要趋势》¹⁷一文中系统地论证了这个基本思想。在200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中，更为深入系统地对此加以论述。读者可以参看。

对外开放，这是一切走进近代发展历程的国家所必经之路。封闭就是自我限制。没有交流，就没有参照；没有参照，就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就不知有先进和落后；因此就不知进取，就没有进步的希望。总会有些人忧心忡忡，以为开放就会引来许多污秽和罪恶，同时却把老祖宗许多宝贵的东西丢掉。必须承认，在开放条件下，肯定会有些不好的东西，或我们所不需要的东西裹挟进来，我们所固有的许多东西也会遭遇到冲击。但细心地考察一下近代开放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能否吸收好东西，能否抵制坏东西，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身的素质。一切求进取的人，总会努力寻求好的东西，而避免坏东西。反之，那些本身腐败堕落的人，偏会寻求那些坏的或只是玩乐一类的东西，而拒绝接受那些真正好的东西。如以西太后为首的满清贵族们，他们很快就学会玩照相机、听唱片、打扑克等等西洋玩艺儿，却绝对不赞成认真的改革。在下层社会，那些没有志气的人也是很快就染上吸鸦片，玩一些嫖赌的新花样。所以说，社会风气之变坏，不是开放的罪过，而是腐败势力自身的罪过。同样是在开放条件下，有很多人是见贤思齐，努力学人家的长处，或者奔走革命与改革运动；或者引介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或者投身教育、实业，为国家的富强与进步贡献力量。

对于外来的东西，究竟是好，是坏，究竟是否适合我们的需要，这要经过人们的实践来检验，不是靠少数人先知先觉，替大家规定好选择的标准，便可保万无一失。这是事实上不可能的。先知先觉者的宣传教育是不可少的；但最终还是

¹⁷ 此文原为提交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2004年1月举办的国际研讨会的论文，在国内首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一辑（2005年5月）上。

要靠人们的实践来决定选择取舍。

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开放会促进发展、进步；封闭就会陷于落后。

个性主义是人的自觉和人的解放的核心观念。

关于这一点，中国人最多顾忌。因为中国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生活得太久了，宗法伦理观念太深入人心了。君主专制与宗法伦理都是不容许个人独立和自由的。个人独立、自由了，势必威胁到专制制度和宗法伦理的控制。所以在中国，讲个人独立与自由，讲个性主义，从来被视为大忌。杨朱讲个性主义，历千载被口诛笔伐；李贽讲个性主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五四时期，先觉者们破除千载成见，大讲个性主义，总算多少渗透到青年中间，涌现出一批为理想而献身革命与改革事业；为自由而摆脱家庭、宗族的束缚，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人。五四以来在我国革命与改革事业上，在科学、学术与教育事业上，在其他各种社会事业上作出较大贡献的人，都是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或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观念的影响的人。他们敢于冲破束缚，无所依赖，独辟溪径，奋斗进取，终有所成。可以想象，一个惯于依赖家庭，依赖父兄，依赖乡党，依赖上司，依赖固有势力的人，是不可能有大出息的。

个性主义鼓励人们的创造精神，解放人们的创造力。这是社会进步，民族提升，国家发展的最终的原动力。养成依赖心理，习惯于奴顺的人们，怎能发挥出创造精神和创造力来呢？诚然，历史上也有在极端专制统治下，依靠军事化的动员体制，创造出惊人奇迹的例子，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修大运河，等等。如果人们因为艳羨这些奇迹，而替专制集权辩护，那真可谓其心可诛了。这些所谓奇迹，都是以牺牲千万人的性命，摧残亿万人的幸福为代价的，它是不可持续的，不可重复的。秦始皇二世而亡，隋炀帝及身而灭。反观欧洲自从走出中世纪，两三百年的发展，超越了上千年的进步；美国废奴之后仅仅半个世纪，就跻身世界最强国之列。两相比较，我们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不是非常清楚吗？

所以，我认为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应当认准我们的方向，坚持对外开放，随时吸纳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坚持以解放个人为核心理念的改革，使民族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如此，我们就可以保持民族昌盛，国家富强，占据世界发展的前沿。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总结发言

耿云志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们这次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就要闭幕了。按照会议组织者的安排，一定要我做一个总结发言。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本次会议一共收到论文 55 篇，我无法全部看完这些文章。本次会议一共举办两场大会和 12 场分组会议，我也不可能参加每一场讨论，聆听每一位的发言，我不可能了解全面的情况。所以，请大家不要把我的发言看作是总结，而是和方才几位的发言同样性质的，只是个人的感想。这样，我就好说话了。

我想先谈谈引起我兴趣的几个问题。

一个是，有学者探讨五四以后，当时人，其中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和骨干人物，他们作为参与者和过来人，对那场运动的反省和反思。他们所记忆和关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及其实质和意义。还有，他们预期的，这场运动可能的发展趋势。我觉得，这样的研究，以前似乎被忽视，至少是注意得不够。这种研究，这种探讨，很有意义，很有启发。以前，我们大家都侧重在提出我们研究者自己对那场运动的看法，对它的意义进行评估。我们当然是根据许多历史材料，经过分析，得出我们的看法，作出评估。但对那场运动的观察，我们无论如何不如当事者来得真切，没有他们那样直观的感受。所以，他们的记忆，他们的反省与反思，对我们极具参考和借鉴的意义。我希望这样的研究，能够更深入地进行下去。

另一个是，关于女性主义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但过去我们讨论女子问题多半是从政治上和政治思想上看问题，关注的是女子的地位、权利等等。女性主义则要宽泛得多，而主要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看问题。五四当年的先觉者们，有人即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层面讨论女子问题。所以，更深入地探讨一下五四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思潮是很有意义的。五四时期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潮像某些其他思潮一样，部分地是经过日本传到中国来的。但其主要的来源，大约还是西方国家，即欧洲和美国。如胡适介绍美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其价值观，介绍易卜生的女性思想等。而陶孟和，则是当时用社会学的观点讨论女子解放问题最重要的学者。所以说，五四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思潮的主要来源还是欧美国家。此外，我觉得还应该强调一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潮，还应该有其本土的思想渊源。中国女子社会地位的特别低下，是宋代以后的事，此前并不如此。历史上对杰出女子的赞扬，在民间一直都很突出。如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梁红玉助阵以及近代的鉴湖

女侠秋瑾等等。明清时期，也曾有学者和思想家讨论到女子的地位问题，表达出女子解放的薪向。我觉得，任何一种新思想、新观念，倘不能与本土固有的相关的思想、观念相结合，那是很难扎根、发芽、开花、结果的。

第三个是，有关民族主义和外交的问题。这次会议上有几篇文章讨论到民族主义和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斗争的问题。五四运动本身是一场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当然会引发民族主义的高涨。不过，五四运动时期的民族主义，与此前不同，它具有明显的世界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说它是与世界主义相联系的。我想，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联系，主要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克服了基于狭隘民族主义的自大与自卑，认识到世界各民族都应是平等的。因此，应该建立平等的世界新秩序。二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认识到世界上一切被侵略、被压迫民族命运的一致性，从而产生联合一切被侵略、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的觉悟。

五四运动是因外交问题引起的。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是争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研究五四以后中国围绕着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展开的外交斗争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一项课题。近年来已出现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唐德刚先生曾抱憾说，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外交史方面特为薄弱。我也有同感。希望继续有人真正深入到外交史的层次，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第四个是，通过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主要是法国的启蒙运动相比较，以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性质。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与欧洲，主要是法国的启蒙运动相比较，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启蒙运动。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的人，是比照欧洲，主要是法国的启蒙运动而言的；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的人，也是比照欧洲，或主要是法国的启蒙运动而言的。我觉得，是否还可以从启蒙运动的本质含义上来讨论。启蒙，照我的理解，就是“去蔽”。这个“蔽”是“蒙蔽”的“蔽”，是“遮蔽”的“蔽”。在欧洲，在法国，启蒙是去专制主义之“蔽”，去宗教（旧教）之“蔽”，去无知、愚昧之“蔽”；在中国也是去专制主义之“蔽”，去宗教（孔教，严格地说，孔学与儒学都不具备完整意义的宗教性质。但它们在社会上确实发挥了某些宗教的功能，所以“孔教”、“儒教”的说法，一直被采用。）之“蔽”，去无知、愚昧之“蔽”。所以提倡民主、科学，提倡个性解放。这足以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具备启蒙运动的性质，是启蒙运动。

当然，这次研讨会还有许多有意义的话题，还有许多有新材料、有新创意的好文章。恕我不能一一谈到。有许多我还要认真阅读，认真领会。

我有一个感觉，不一定对。我觉得，我们似乎是进入一个过渡期，我们正处在两个高峰之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每隔十年，举行一次较大规模，较高

水准的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研讨会。前几次研讨会，特别是 1979 年和 1989 年的两次，因为是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初期阶段，那时，有一些大家都共同关注的焦点，有一些重要的人物需要重新认识，所以有很集中的议题，和围绕这些议题展开的很集中的讨论。现在好象大家关注的问题比较分散。比如，本次会议收到论文 55 篇（会议材料统计 56 篇，但其中有一篇，不是论文，所以，论文只有 55 篇）这些文章涉及的方面，非常之多。过去，比如 1979 年那一次，单是讨论陈独秀的论文就有十多篇，讨论胡适的，也有 6-7 篇，其他如鲁迅、李大钊等也都有若干篇。这一次，涉及到相关人物的颇不少，如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孙中山、吴敬恒、钱玄同、汪精卫、殷海光，以及林琴南、梅光迪，此外还有当时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哲学家杜威等等。人物很多，但涉及每个人物的都只有一篇文章（个别的有两篇）。所以，显得很分散。其他的文章，也很分散。如有讨论当时人对五四的反思的问题，有讨论五四时期主要思想流派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有讨论激进主义的问题，有讨论民族主义与废约外交的问题，有讨论宗教的问题，有讨论社会改造与社会理想构建的问题，有讨论知识群体的问题，有讨论地方教育团体的全国性影响的问题，有讨论工人运动的问题，有做人物考证的，有讨论文学史的，有研究当时的报纸、刊物的，等等，等等。但每个问题差不多都只有一两篇文章，最多也不超过三。所以我说，这一次，大家关注的问题很分散，没有明显的共同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也有它的好处，就是表明，研究工作正在向各个角落，向历史的深部和细部渗透。这种渗透，经过相当时间的积累，有可能形成大家共同关注的新的焦点，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获得新的突破。

如果我的感觉不错的话，那么，再过十年，我们也许就会迎来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新的高峰时期。那时，让我们再相聚。

谢谢大家！

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成立 20 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

（2009 年 4 月 27 日）

耿云志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非常欢迎各位前来参加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成立 20 周年的庆典，我代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全体同人向各位致以崇高的敬意！

20 年前的今天，本会正式成立，当时承蒙许多领导和老前辈光临，使本会成立伊始，就受到多方关照，会务得以顺利发展。20 年来，本会秉持既定宗旨，弘扬五四科学民主的传统，团结学界同人，加强中国现代文化的研究工作，促进海内外的学术交流，提高全民族的精神素质，为推进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我们曾成功地举办过三次高水准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发挥了有益的影响。我们还曾多次举办学术座谈会，对于团结同人，加强现代文化的研究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本会同人们还撰写或编辑了多种大型的研究思想文化和文化史方面的著作、资料书与工具书，如《中华文化辞典》、《五四风云人物文粹》、《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国历代治国策选粹》、《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等等，这些成果都在学术界赢得好评，产生良好影响。

各位朋友，我们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作为民政部注册的一级学会，其下还有几个分支学术团体，如胡适研究会、企业文化研究会、口述历史研究会、闻一多研究会等等。他们按照国家有关社团的法律、法规和本会的章程进行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发挥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总结 20 年来的经验，我们觉得，坚持按照学会的章程，秉持学术立场开展学会的工作，是我们取得良好成绩的基本保障。我们都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这是我们的本行。而学会也是学术团体，本身即肩负着推动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责任。立足于学术开展工作，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长处所在。今后，我们仍将继续本此原则和立场，开展我们的工作，争取取得更大的成绩。

朋友们，20 年来，本会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绩，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近代史研究所的领导和有关同志的关心支持分不开的。借此机会，我代表本会同人们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会开展各项活动中曾得到许多老前辈们的关心和支持。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故去了。如肖克先生、伍修权先生、胡绳先生、夏衍先生、陈荒煤先生、冰心先生、陈翰笙先生、刘大年先生、李新先生、李慎之先生、唐弢先生、温济泽先生、龚育之先生、郑惠先生等；有些则仍继续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如李锐先生、于光远先生、季羨林先生、韩天石先生，还有原政协副主席王文元先生、原文化部长王蒙先生、原社科院常务副院长丁伟志先生、汝信先生；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陈昊苏先生、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先生、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以及全国市长协会秘书长陶斯亮女士等等。在此，我谨代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同人们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

此外，我们还要感谢许多兄弟单位所给予我们的帮助。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广东人民出版社、黄山

书社、辽宁教育出版社、东方英才教育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以及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等等。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新闻媒体的朋友们多年来所给予的大力支持，我特别要提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的朋友们，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也不可能取得上述那些成绩。

朋友们，再过几天，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我前面说过，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基本宗旨就是宏扬五四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的传统。所以，如何继承和超越五四，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应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希望大家就此热烈地讨论，充分地交换意见。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借此机会，大家互相联络感情，交流心得。同时，我们更希望听到各位对本会今后开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客气，请把学会当作自己的家园，大家协力，把学会的工作做得更好。

谢谢！

陈独秀：我们如何表达

孙 郁

—

谈论陈独秀的困难不都是政治上的原因，那大概是文化转型期复杂的背景所致。我在读他的遗著时，倒是常常关注他对中国现代智慧表达式的贡献。不妨说，自从他和胡适、鲁迅出现以来，读书人的书写才有了现代性的意味。

《新青年》出世之前，谈论知识阶级的话语，从来没有形成气候。是陈独秀的振臂一呼，出现的多是新人、新观念、新思维，许多精神难题都在这里登台了。我们这些后来的人面对这份杂志，有时不得不感到惭愧。原因呢，是今人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在表达自我的时候，没有那代人的清俊智远。就精神的从容来说，陈独秀与胡适、鲁迅诸人，精神是一洗前尘的。士大夫阶级的那一切，被他们阻挡到历史的暗区里。我们说言说的放达自《新青年》始，那是不错的。

旧式文人没有类似的表达，只有复述与迎合。至多不过小情调的倾诉，坦然地言说者不多。要表达，就要有新思路和新词语。所以，《新青年》的功劳之一是拥有了新兴知识阶层的个性表达式。胡适趋之于前，鲁迅急行于后，陈独秀在

前后间摇旗呐喊，搭建了一座很大的舞台。中国旧学的陈腐的东西，在这里崩塌了。许多现代性的思想、思潮，在这里都有。

陈独秀开创新文化的园地，不是个人的喜好使然，而是时代进程的一个逻辑的必然。一开始他的同路者不多，于是只好从域外寻找留学生资源。他的看上胡适，乃是精神里新奇的空气，让人从昏睡里醒来。迂腐的那一套消失了许多。他们之间讨论白话文，深层里就有对旧式文字的绝望。而且，在陈氏等人看来，中国文化的大问题是，人们的表达出现了问题。所以，如果要搞改良和革命，必须从自由的言说与书写开始。

在《新青年》的文章里，陈独秀的表达逻辑给我很深的印象。他最不满意的是“伪饰虚文”、憎恶“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文字，于是提倡写实主义，力主睁开眼睛看世界。优雅明洁之情智，才是应当提倡的，不可落入陈陈相因的迂腐之地。新文化讲的自由，其实就是表达的自由。思想的载体如果不能进入自由的言说的领域，一切还都是老样子的。

初期白话文的讨论颇为有趣，胡适与陈独秀商谈白话文走向时，重点强调不用典，要口语入文。还应当拒绝对古人的模仿。在胡适看来，模仿古人和乱用典故，易华而不实，滥而不精，乃文章之大忌。好的作品都非无病呻吟之作，艺术是从心里流出来的，而非造出来的。这是《新青年》当初要解决的问题。陈独秀在与友人讨论此话题时，延伸了其内涵。他以为胡适的观点还有些温和，要建立真正的白话文，不能不有峻急的文风。他自己就喜欢用此类笔法为文的。

陈独秀、胡适、鲁迅的文字，流出对旧文人习气的厌恶。他们远离官场，揶揄神灵，但他们最想做的是对士大夫文化的颠覆。那时候陈独秀的文字就一反士大夫的正襟危坐气，不中庸，非暧昧，将儒家的虚假的东西踢出去。一时应者如云。比如说极端话，讲极端句，旨在从四方步式的摇曳里出来，精神的躯体被换了血。而鲁迅的《狂人日记》，简直就是天人之语，读书人的自恋语气全然没有了。鲁迅和陈独秀相似的地方是，都对自己的本阶层的人以嘲笑和绝望的目光视之。意识到连自己也充满着罪过。重新开始，远离着无病呻吟之徒的文字，是那时候的新文化人特有的特征。

解决书写的旧病，一是输进学理，引来新观念和思想。另外呢，是个性主义的展示。在那一代人看来，中国文化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人的自我意识，人不过还是奴隶。向人的内心世界开掘，直面世界才是重要的。所以那时候文章好的，都是有留学经历的人。他们的文字是从个性文化那里沐浴过的，说的是自己的话，而非别人的意识。

但那时候大家的思想也不尽一致，胡适还是把白话文看成工具，注重表达的自然和平易。而陈独秀则认为艺术之文与工具理性略有不同，有创造性的一面在

里面,是不能忽视的。鲁迅和周作人则一开始就呈现着语言的神异性,他们在白话里多了精神的舞蹈,不断冒犯旧的词语搭配习惯。表达在他们看来不仅是思想的演示,也是创造快感的呈现。而后者,那时候没有人重视的,大家其实还不能立即意识到这些。只是在《呐喊》问世后,人们才意识到,智慧对审美的意义大于观念形态的东西。不过,后来的艺术发展,还是观念在主导着审美的思维,能做到鲁迅这一点的人毕竟是有限的。

二

毫无疑问,《新青年》的面孔所以诱人,乃是多了世界性的眼光。同人们讨论问题,已不再是“天下”、“华夏”一类的民族主义心态,精神是开阔的。这里主要的功绩是翻译。如果没有现代翻译,就没有新生的白话文。或者说,翻译对陈独秀那代人来说,是建立新文学的基础。他在杂志上不仅翻译了美国国歌、法国散文,还编译了科学思想史方面的文章。他最初的译文,也是文言的,后来自己也不满意这些,当看到胡适所译的契科夫、莫泊桑的作品时,才感到白话翻译的可能性。后来他推出的易卜生话剧、屠格涅夫的小说时,已经感到新文学的书写是具有一种可能性的。

1916年,陈独秀写信给在美国读书的胡适,希望其多介绍美国的出版物:“美洲出版书报,乞足下选择若干种,详其作者,购处及价目登之《青年》,介绍于学生、社会,此为输入文明之需要。”¹⁸胡适应邀在《新青年》发表了多篇译文。像莫泊桑的小说《二渔夫》,发表于1917年,完全是白话文。所以说白话译文在前,白话创作在后,那是不错的。正是翻译的白话文的成功,才刺激了鲁迅的写作。先前人们不提这些。实际上,陈独秀对此是心以为然的。他的催促之功,胡适与鲁迅都颇为感激。

用翻译来刺激创作,是陈独秀的梦想。但他深知自己没有这样的才华,于是在翻译之余,喜欢编译。他的许多文字,都留有这样的痕迹。《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俄罗斯革命与我国国民之觉悟》、《近代西洋教育》,都显示了他阅读外文的功力。他一方面借用了洋人的思想,返观国人命运;另一方面从对比里思考超越自我的内力。他在组稿时,有相当的选择性。其实最欣赏的是思想性的文章和有个人主义色彩的作品。这两点,在中国最为难得。中国文人不经西洋文明的沐浴,难以再造自己的文明。

陈独秀在译介中形成的东西方文化差异观在那时候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他对

¹⁸ 《陈独秀书信集》46页, 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这个差异的概括一直在影响着后来的人们。比如“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¹⁹。直到八十年代，中国大陆重新出现文化热的时候，学人们似乎还没有超出陈氏的眼光。他的穿透力是内在的，学人们很长一段时间直面的是相似的问题。这也是他的启蒙的基本思路，而对文章与艺术变革的思考，也是缘于此点的吧。

不过陈独秀的表达，在那时候还显得急促，似乎没有完全消化人文主义的思想。他自己的文字内美，未必就比梁启超高明多少。只是见解高于对方罢了。主要的问题还是立言、立志，而非精神的盘诘与深省，自然没有哲学层面的高妙和艺术的深情致远。他反对旧文人的“载道”，自己未尝不是在走这条路。他神往自我的个性表达，但在那时肩负着使命，只能把目光盯在传道上，心性的攀援只好置之一边。启蒙者的悲哀往往是这样的：他们要唤起民众，推倒旧的逻辑，可是自己必须进入这个逻辑后才能出离旧路。而自己不幸也在这个逻辑中。既是启蒙，又是个人主义，在那时候殊为不易。所以是否真的消化了洋人的思想，还是一个问题。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不过是借着这些，来讲自己的意思呢。

三

士大夫的问题是不谙俚俗，缺乏民间的狂欢与放荡。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民间艺术可以堂而皇之地走进象牙塔里了。在瞭望西方文明的同时，陈独秀诸人不忘对本土文化的整理与重新解读。查阅《新青年》的文字，能够感到诸人对民间艺术的钟爱。传统士大夫看不上戏曲、说书艺术，以为粗俗不堪，难以入流。在雅化的文字里，生命意志一点点磨掉了。五四新文人不这样看，他们完全反过来，视民间艺术为真品，对文人圈子之外的存在，有一种亲密的感觉。陈独秀、胡适在理论上倾向于民间文化，鲁迅则在自己的小说里刻出了民俗图，韵律与气象完全不同于以往了。中国后来强调的大众化艺术，讲的就是这些。说他们这一代是创始者，那是毫无疑问的。

钱玄同曾与陈独秀专门讨论过民间艺术的话题。他们之间的那次通信，在新文学史上已成为佳话。两人都推崇戏曲小说，乃因为是离人生近，与玄学远，是可亲的一族。他与陈独秀说：

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实今后言文一致之起点。此等白话文章，其价值远在所谓“桐城派”“江西派之诗”上，此蒙所深信而不疑者也。至于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

¹⁹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新青年》一卷四号。

若论词曲小说诸著，在文学上之价值，窃为仍当以胡君“情感”、“思想”两事
为为标准……²⁰

陈独秀的 回信亦有同样的思路：

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
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绝无进步之可言。章太炎先生，亦鄙视小说
者也，然亦称《红楼梦》善写人情。夫善写人情，岂非文字之大本领乎。
庄周、司马迁之书，以文评之，当无加于善写人情也。八家七子以来，为
文者皆尚主观的无病而呻，能知客观的刻画人情者盖少，况夫善写者乎。
质之足下，以为如何。²¹

用戏曲、小说来冲击士大夫之文是一个资源。但如何将其精神引入思想界，
那时候的同人没有什么办法。周作人在介绍日本近三十年的文学时，也讲到该国
文学里民俗意味的深情。可是中国如何学之，也只能交了白卷。要不是鲁迅从乡
土社会里找来一些元素，陈独秀的期待要落空也是自然的。

五四运动前，陈独秀曾经对戏曲有过一种改良的期待，那就是用西洋的个性
主义的思路，冲击老的营垒。比如不唱淫戏，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等。他在内心
是欣赏民间艺术的，因为那里有百姓的想象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俗学意义
下的传统文化的认可，并不亚于对西洋文明的态度。陈独秀所写的这方面文章虽
然不多，但他对胡适、鲁迅、周作人的民俗观的赞同，其思想的新亦庶几可见。

五四文人讲民间，是指未被士大夫文字浸染的领域。所以陈独秀自比是狂客，
周作人说自己是学匪，鲁迅把自己的房屋取名“绿林书屋”。这就是要和文人气
划清界限。但他们这些匪气还是有些六朝意味的东西，与民俗的东西毕竟有别。
周作人很早意识到这一点。他是主张在文字里出现一些文不雅驯的东西的。因为
英国文学里就“麝用方言，视若庞杂，然自有其异彩，趣味盎然”。²²待到北大进
行风俗调查、搞歌谣征集时，民间话语与白话文的关系就真的亲密起来了。

陈独秀称赞鲁迅的小说好，思想的深不用说了，重要的是他的文字运用能力
超常。五四时期鲁迅的一些文章并非自创。有些观点是受胡适、陈独秀的影响的，
有的从尼采、安德烈夫那里来。但他的表达逻辑真的与人不同。同样一个意思，
经由鲁迅之手，就气象不俗，别有一格。那里有古文的余绪，绍兴的韵律，还杂
以日文、德文的句式，文章的张力就不同了。《新青年》的伟力固然是思想的多
致与自由语态，可是在我看来表达的创造性是一大奇迹。说什么是重要的，怎么
说也非小视之事。对于一个不会表达的群落来说，将思维从庸常里引向高远的精
神之地，一个时代能肩负此任者，真的不多。

²⁰ 《陈独秀书信集》96页。

²¹ 《陈独秀书信集》92页。

²² 《周作人文类编》六卷51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四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陈独秀的文章在气韵上是晚清狂士的路，并非创造性的。胡适倒一洗旧气，完全是纯正朗然的东西。惟有周氏兄弟，在文章的写法上自成一格。新文学要求是睁着眼睛看人看事，周氏兄弟有点六朝的影子和日本随笔的笔意。鲁迅的文字甚至带着德国尼采的激越，荡涤着人间杂尘，给人很深的印象。表达的新奇，是应当在意识深处自新的。

真正使新文学闪亮的，不是技巧类的东西。而是那时候的流行观念，即世界意识。世界意识的出现是颠覆儒学的利器，也是表达自我的前提，也不妨说是马克思主义登台中国的前奏之一。

刺激五四前辈的是西方个性主义文人的新作品，在易卜生、王尔德等人的作品里，对西洋的批判，以及流出的大众意识，使陈独秀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罗素的对国家主义的痛斥，也激发了中国读书人对世界共有的价值的渴望。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甚至是世界语的提倡者，他们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下的精神书写极为警惕。用世界的眼光看事，在他们看来应是必然的选择。

在陈独秀与友人通信里，常能看到艺术无国界之类的字眼，赵仁铸给陈独秀的信就说：

先生等闻此琐屑之谈，吾知其必厌然乏味矣，今请简述之曰：(一) 中国之教授在此过渡时代，非本国所能任也。(二) 请真有学问之外国人在此为教授不足耻也。二十年前之英吉利，欧战前之美利坚，其著名大学教授均为德人铸自离开北大后，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院内研究有机化学，所从之教师，非美国人乃瑞士人也；楚材晋用，美国尚如此，在我国亦何伤？⑥

陈独秀对此是认同的。他赞成未来世界是大同世界，各民族会在一个旗帜下生活，乃未来之趋势。在致陶孟和的信中，他说：“来书谓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此鄙人极以为然者。”既然讲大同，那么就不能不废除旧学问的那一套，从别国那里窃来火种，用以照着精神的暗区。思想向西洋的个性化书写靠拢是必然的了。

自由的书写者，是厌恶浪漫的逃遁，直面社会的难题才是真的人。陈独秀一再强调写实，要求新文学不是逃逸人间的，而是与之对话的。现实的复杂黑暗，在我们的作品里反映的太少，旧文学一直回避这些。一旦深入打量生活，就会发现，我们的道德伦理、法律条文，大有问题。所以，写什么，怎么写，我们过去没有很好地解决。陈独秀认为，要改变旧的书写习气，惟有写实主义可以救之。

那时候被普遍认可的易卜生的戏剧，就是写实的代表。作者所以能有如此高

的水准，胡适曾有过评论，那就是作者曾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大地变为个性主义的文人了。易卜生在致友人的信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不算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²³

胡适颇为认可这一句话，陈独秀、鲁迅自然也是如此。易卜生的文学非神学的，也非国家主义的，回到人自己的深处，是他的选择。个性的解放才有文字的解放，五四新文化在那时要高扬就是这个东西。

五

但《新青年》最引人的书写风格，并非都是洋人的观念，其非道学的态度颇有强力。陈独秀和他的同人是厌恶道学气的，尤其是韩愈以来的“载道”的传统。他们那时候推崇的是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但丁、果戈理、雨果一类的作家。我们中国的文学除了《红楼梦》外，很少这样的一类作家的作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个人，没有自我，不会真实地表述世界与人生。

在这些同人看来，中国文学一直存在两个对立的传统。陈独秀说那是贵族与平民之对立，胡适谓之“元白传统”和“温李传统”之不同，周作人发现是“载道”与“言志”的区别。他们都想在此中寻找到一个正确的对象作为自己的参照。可是后来，鲁迅、周作人等意识到，对立还不及融合，彼此的交融，艺术才能更有趣味吧。在强调平民文学时，也不要忘记读书人的创造性劳作的价值。只有平白易懂的诗文还不够，在文字里凸现智性的劳作，让人知道文字后的精神的无限种可能性，也是重要的。

陈独秀对“载道”文学的痛斥在当时颇有影响，他认为韩愈以来的“载道”是大谬误。“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迄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所以，文学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直抒性灵，言自己之志，非暗袭古人的无病呻吟也。鲁迅多年后回忆自己的写作时，特别感谢陈独秀的作用，称自己是“听将令”，受到了陈氏的鼓励。这一点，是没有人质疑的。

新文学最初以白话诗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那些幼稚的作品，在当时的反响超人所料。陈独秀自己没有这样的作品留世，但是他欣赏诸位的创作。因为，

²³ 转引自《胡适全集》一卷61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很是简单，那是新思维下的心灵的作品。废名后来对《新青年》时期的诗歌有个很中肯的评价。以为在审美的层面完全别于古典的作品，是新的艺术。旧文学是文生情，做作地模仿前人的调子，自己的心理未能完全敞开。而新诗不同了，它是情生文的，没有旧的套路。这是汉字写作的一次飞跃，人们可以靠真实的感受为文，而非奴仆地创作，那意义是非同小可的。

废名在总结那时的白话诗歌时，既肯定了胡适的晓畅自如，也看重鲁迅的隐曲幽婉。在评价鲁迅的新诗《他》时，他说：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说这首诗好像是新诗里的魏晋古风。这首诗里的情思，如果用旧诗来写，一定不能写得这样深刻，而新诗反而有古风的苍凉了……这首诗里诗人的气氛太重了，像陶渊明的《荣木》与夫“寒华徒自荣”本来不完全是诗，尚有哲人的消遣法，鲁迅先生的《他》则是坟的象征，即是说的“埋掉自己”即完全是一首诗，乃有感伤。²⁴

这里的感叹，是对审美的独异性的致敬。陈独秀、胡适当年都没有这样的创造，自然在理论上也不能明白于此。所以，新文学的诞生，理论在前，实践在后，实践中出现的个性化高蹈，远比《新青年》主编的预料要丰富。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谈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的名气要大于别人，实在是其表达的高度为同时代人所难能及之。那个高度，使新文学的面孔，一下子变得很有内容了。

陈独秀意识到了新的表达式的价值，但那个表达式如何可能，他无力实践。看他的文章，是对一种确切性的陈述，把对精神的复杂与隐曲的表述留给了别人。他的文字在气脉上是有古风的，得到先秦的豪迈之气，又见六朝的风骨。但意象取之于洋人的直抒性情之路。尤其是他的旧体诗，形式是旧的，而气韵则和士大夫者流渐远了。他的时评与随笔，没有掩饰的文辞，是心性的袒露，可以说是方向感的文字，理念化的演说。他是新文学的呼唤者、引路者，至于那个新的图景如何，自己并不知道。他甘愿在新的时代到来之前，做一个铺路人，待到新人出现后，自己消失了也是心甘情愿的，毁誉与自己已经没有关系了。较之于同人们，他是向外表达的人，将自己隐到自由理念的背后；鲁迅是自我对自我的表达，没有居高临下的感觉。胡适是介于二者之间，既能布道，又带自恋的一面，其书写方式是弹性的。至于周作人，那就分明有点自言自语，完全是个人主义的吟哦。五四文人的写作，一开始就没有一种套路，多样性的出现，也恰是陈独秀所期盼的。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文字都是新文学理念的基石，他的宣言体对后来的人影响深广。他似乎没有想到不朽与永恒的话题，甘愿冲到前面，将旗帜高高举起，自己的任务也就完成了。那段关于文学革命的话，多么让人心动：

²⁴ 《废名讲诗》55页，华中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界英豪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大炮，为之前驱！²⁵

中国文学的历史有两千余年。但奴才式的写作时间长，作为人的写作的历史却短。陈独秀那代人的大功绩是阻挡了历史的惯性，在昏暗不堪的年代，开始了自由人的写作。他们那些人差异很大，精神也非定于一尊。有的人的文章也未必高明，甚至有些荒唐。可是他们的非同寻常的地方是，将个性的空间打开了。这是一个不小的突破。现代性的资源终于从此涌出，古老的幽魂从此不再可能堂而皇之地出现了。时间开始了，我们不应再回到过去。闸门打开的时候，河流就不再干枯了。

2009年1月31日

胡适研究会十七年来的工作

宋广波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今天，是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成立20周年，作为现代文化学会的一个分支机构，胡适研究会也有十七年的历史。在这里，我受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先生的委托，简要汇报本会十七年来的工作。

胡适研究会的成立与第一次全国规模的胡适学术研讨会的举行有密切的关系。1991年，是胡适先生诞辰100周年，在1990年，经耿云志先生提议，得到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先生的支持，又得到安徽绩溪县政府、安徽大学、历史研究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鲁迅博物馆以及名人研究中心等单位 and 机构的资助，乃于1991年11月在胡适的家乡，安徽绩溪县举办了历史上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还得到了当时徽州专区党委书记胡云龙先生和我国著名的出版家，胡适先生的同乡后辈王子野先生的

²⁵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二卷六号。

大力支持，他们两位都亲自到会和与会学者们进行深入交谈。这次会议，有六十多位学者参加，我们选收其中部分优秀论文编辑出版了论文集，名为《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此书的出版，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反响，后来竟又加印了一万册。一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竟有机会重印，这大概是学术史上没有先例的。

这次研讨会的成功还在于，它把全国从事胡适研究的学者凝聚在一起，大家殷切希望团结合作，把胡适研究这个课题做得更全面、更深入、更有系统，对我们的学术进步发挥更大的影响。于是，第二年（1992年），部分学者在北京再次聚会，经过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应当组织胡适研究会，来联络海内外对胡适研究有兴趣的学者，整合研究力量，组织学术会议，和有计划地出版胡适本人的著作以及研究胡适的著作，以便推动胡适研究的不断进步。

胡适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胡适研究会在青岛举办了第二次胡适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国际性的研讨会。会后，我们把一些优秀论文编入《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中。《胡适研究丛刊》一共出版了3期，其第3期于1998年出版。1995年，胡适研究会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在上海举办了第三次胡适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我们请来了胡适任驻美大使时曾经担任过胡适秘书的傅安明先生到会，并报告他的论文。当时，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以及胡适当年的学生周南先生都参加了会议。此后我们又陆续举办了多次小型的学术研讨会，其中2001年，我们举办了纪念胡适诞辰11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上，有一些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提交了论文，比如著名的龚育之先生，它标志着，胡适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以至过去一直把胡适作为批判对象的党史学界，也开始比较客观地看待胡适了。2008年12月17日，本会应安徽省绩溪县委和县政府的要求，在绩溪主持举办了“胡适先生诞辰117周年座谈会”，参加会议的除大陆胡学界的学者外，还有来自美国的周质平教授，以及台湾胡适纪念馆馆长潘光哲先生等。与会专家除交流胡适研究的新成果外，还对绩溪县拟议建设的胡适纪念馆建言献策。

除了举办各种规模的学术研讨会，我们还编辑出版了许多有助于推动胡适研究的书。如大型资料书《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胡适传记作品集》、《胡适论争集》、《胡适书信集》以及胡适的图片集《胡适及其友人》等等。这些书出版后，都成为胡适研究者的必备书，非常受欢迎，在学界发生了很好的作用。

早在2005年，本会耿云志会长即和国内某出版社达成协议，准备出版由本会编辑的《胡适研究论丛》，并于2006年将书稿交付出版社。从2008年开始，胡适研究会开始定期编辑印行《胡适研究通讯》，到目前已印行5期，反应出乎意外的好。我们正在努力把它坚持下去，力求办得更好。并决定把《通讯》中发表过的比较优秀的文章汇集起来，收入定期出版的《胡适研究论丛》，该《论丛》

的第1辑已经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胡适研究会成立17年来，以推动胡适研究为宗旨，秉持稳健、严谨的态度，已经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引领胡适研究的中坚组织。本会会长耿云志教授，利用个人在胡适研究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进，广泛团结海内外有志胡适研究和热心推动胡适研究的朋友，使这个胡适研究的团队不断扩大。

朋友们，后年，2011年是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我们准备届时举办一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希望大家给予支持。谢谢！

我的“胡适阅读史”：被阉割的“五四火种”在台湾 ——《容忍与自由：胡适思想精选·编辑后记》

潘光哲

自从渐渐地不需要仰赖注音符号就可以读书阅报以来，父亲的书架，便是我开始进行探险的天地。那正是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台湾离开联合国的时候，身为职业军人的他，放在那里最多的，或是国防部编印的《处变不惊庄敬自强史例》之类的书，都是白色封面的精装本；或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编印的《中央月刊》，花花绿绿的封面，每个月各不相同。这些书的基调，千篇一律，外加不认识的字实在太多了，读没多久，就觉得乏味之至。意外的是，胡适的《四十自述》与冯爱群编的《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居然与国民党党国体制的那堆宣传品夹杂在一起。前者是台南大东书局的版本（现在看来，当然是部盗版书），后者是台北学生书局出版的。两部书的出版时间与父亲题写在内页的收藏时间，都是一九六二年三月，恰是胡适去世后的一个月，台湾追悼胡适的情绪最为热烈的时候。显然，一介军人的父亲，也受到这波热烈的感染。这两部书的封面装帧，绝不出色，本来难能吸引幼童的目光，它们是无可选择之后的最后选择。不过，意外发现之后，它们成为《国语日报》与《王子杂志》等儿童读物之外，最能吸引自己的书本。

刚捧起《四十自述》的我，最初根本不知道胡适的本名「嗣糜」和他的二哥「嗣秬」、三哥「嗣秠」究竟该怎么念。胡适注记了「糜字音门」，可是，「嗣」、「秬」与「秠」呢？非知道不可的冲动，让我从摸索里学会了查《辞源》的本事。知道答案之后，自然越查越起劲，越读越过瘾。等到被允许单独出门去逛号称「书街」的台北重庆南路，在众多书店里寻觅胡适的书，是自己的「第一志愿」。那套得到胡适授权，由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的四大卷《胡适文存》，是

在那家书店里发现的，已不复记得，却永远忘不了，那是我第一次享受到找书觅书居然「美梦成真」的快乐滋味。只是，快乐之后，马上就是痛苦了。那不是家里买得起也愿意买给孩子的书；眷村和小学里都没有图书馆，这套书无从借起。可怜那时我也不晓得有公立图书馆可以满足自己的阅读好奇；只好有空就去书店里「站岗」，企图毕其全功。然而，胡适的文字再怎么浅显易懂，不可能是小学生站在书店里看得完，而且全部都看得懂的。只有再三翻读《四十自述》这两部书，聊以藉慰。小学毕业典礼上颁发的台北市「市长奖」奖品，会是一套《胡适文存》吗？一直是我的幻想。当然，这两样我都没拿到。

初中时代，国文课本选录了胡适的〈我的母亲〉，出自我早已读过的《四十自述》。然而，那三年却是绝对不容许人喘气找胡适来看的时候。等到一九八〇年夏天高中联考结束，开始暑期打工，拿到工钱的第一件事，就是骑脚踏车去当时还位于台北光华商场旁的水平书局，买了一套与远东版内容一模一样却未署出版者的《胡适文存》。同样是远东出版的，《胡适文存》的售价为什么比梁实秋编的高中英汉辞典贵那么多，是我那时最大的好奇之一；无可奈何之下，只好买盗版的本子。同一时候，李敖突然「复出江湖」，他的《胡适研究》与《胡适评传》由远景出版公司新版上市，轰动一时。将《胡适文存》与这两部书合并而观，不仅引起我探寻李敖其人其书的「前史」的兴趣，他指责远东版《胡适文存》的错误和删节部分，更指示提醒了我，在旧书摊寻觅《文星》和《自由中国》之外，也得留心有没有「原版」的《胡适文存》。前面两种杂志与《文星丛刊》乃至柏杨、钱穆、徐复观与殷海光，都找到了不少，后者则从来不见「庐山真面目」。沉迷于旧书摊（以及棒球场）的代价是沉重的，一定得补考才能升级的命运，让父亲气得说要把我辛苦找到的李敖和柏杨的书，统统都烧掉。还好，参加全国作文比赛拿名得奖的成绩和那堆胡适的书，成了「挡箭牌」，他老人家终究没有付诸行动，也逼得我把心非放回准备大学联考上不可。

始终挂念的「原版」《胡适文存》的本来内容，一直要到一九八六年当远流出版公司得到胡适纪念馆的授权，推出壮观的三十七册的《胡适作品集》之际，方始知晓。已经是大学生的我，读过胡适秘书胡颂平先生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十大册以及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忠栋先生的〈胡适从「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论〉一文，早就知道了《人权论集》的存在。所以，我更好奇的是，胡适在这部书里究竟是怎么批判国民党的？好不容易，辗转从张忠栋先生那里得到《人权论集》的影印本，总算满足了我的好奇；它更一度是我揣摩再三学习撰写政论文字的蓝本。

原来，李敖批判远东版《胡适文存》删节的，主要是胡适发表在《努力周报》的政论文字的部分，其中颇多对孙中山的「不敬」之语，甚至于对孙中

山和陈炯明间的冲突纠纷，胡适更是站在肯定后者的立场上。当台湾对这段历史的诠释，以孙中山之「是」为「是」，以孙中山之「非」为「非」，称之曰「陈炯明叛变」的时候，要在台湾再度出版《胡适文存》，他当年的政论意见，绝对「不合时宜」，非删不可。只是，谁都料想不到，动手「阉割」《胡适文存》的，居然是胡适本人。直到远流版的《胡适作品集》，终于才「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而，胡适在《人权论集》里对国民党的批判，更为激烈，批判的矛头，更直接指向蒋介石。所以，在台湾总统还姓蒋的时代，远流即使可以「勇敢」地出版《胡适作品集》，却绝无再版《人权论集》的「勇气」。至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也只选录《人权论集》的〈序〉，却未可录其全文，自然都可以理解。我能读到《人权论集》的影印本，已经是桩「福气」了。

大江总是向东奔流的。从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起，台湾政治上的一切禁忌，被怒不可遏的社会力「冲决网罗」，认识胡适全貌的可能性，也不例外。特别是，张忠栋先生在一九八七年将他的〈胡适从「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论〉及其它文章汇为《胡适五论》，以这部书的出版为标志，胡适独特的生命旅程，从此不再是重重迷雾笼罩的历史命题。张先生的这部《胡适五论》，以严谨的学术规范为基础，秉史家如椽之笔，直书无忌，尽可能精确地书写过往岁月的纪录，既揭穿党国威权体制一贯「英明伟大」的真相，也像是万马皆闐的时代里的正义之声。可以说，在「胡适研究」的「复兴」浪潮里，张先生的研究成果，实位居新起浪头的第一波。以胡适的生命史为对象，让人能够贪婪阅读各种文献，窥视其间无限风采，并且得到跳脱出政治神话囚笼的思想刺激的时代，终于降临。诸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的影印出版，以及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三大册的简体字本的《胡适来往书信选》等相关文献资料，在台湾的大量出土与流通，阅读胡适，根本不再需要寻寻觅觅了。思想观念的禁区不复存在，研究胡适，可以自在地开展漫无边际的「知识探险」活动。当然，自由研究阅读胡适，与发扬实践胡适思想，是两回事。像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翘望以待的理想生活世界，仍是征途漫漫。

胡适做为「五四」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又归骨埋骸于台湾，在台湾传递「五四火种」的起跑者，他自是当之为愧。因此，胡适的各种著作，始终在台湾出版不辍，亦且盗版连连，正展现了胡适的吸引力。可是，现实政治却压制了人们对于胡适的认识与理解，「五四火种」在台湾的薪传空间，也逃脱不了党国体制「魔掌」的控制。我的「胡适阅读史」，从盗版书读到影印本，再读到经过授权的「合法版本」，而后又收集到来自中国的各种简体字本，既展现了胡适在台湾流传轨迹的一个面向，多少也是台湾转变的象征。

当下台湾处境里的读者，不必品尝寻觅胡适的辛苦历程。然而，人们可

能面对的问题，不是去那里才能读到胡适，而是描述胡适爱情世界的书更为流行的时候，除了「消遣」之外，为什么要读胡适。举例来说，对「统独」、「蓝绿」等等让人好似困惑难决的问题，胡适那里自然找不到直截了当的答案。只是，在廿世纪的华人历史舞台上，占据一个枢纽位置并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碰到的困难抉择，绝对不比我们少。胡适的抉择，叫好拍掌的响应，固然声振一时；批判詈骂的声浪，也是响彻云霄。胡适面对时代潮流与现实环境做出的选择，为什么「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都有可供思考的借鉴意义；胡适做出抉择后的复杂心情及其历史结果，还值得细细的品味反省。在「爆料文化」主宰台湾的公共论坛，以「名嘴」的是非为是非不容讨论辩难的此际，胡适期望「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胡适主张不要「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应当犹具相当的启发意义。

在台湾已不再是被阉割的「五四火种」，还能传薪不已吗？重新阅读胡适，应该会回答这个问题的一道路径罢。

（潘光哲编，《容忍与自由：胡适思想精选》，台北：南方家园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

再现胡适

六小龄童

大概在2月初，我接到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领导，也是30集电视连续剧《和平之盟》（暂名）的编剧李汀先生及本剧制片人的电话，希望我在这部建国六十周年献礼片中扮演文化名人胡适先生。

我接到电话后感到这既是对我演技的挑战也是考验，最开始知道胡适这个名字是从一本台湾版的《西游记考证》的书中，慢慢熟悉了他，但也不是很了解他。后来看过了凤凰卫视的《文化大观园》栏目的《拨开云雾见胡适》节目，这与我们小时候在内地所了解的胡适有很大的不同，相对来说是更生活中的胡适。为了更好的演这个角色，我很快从网上找来了一些有关胡适的影像资料，包括台湾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黑白纪录片《胡适先生在台湾》、《胡适先生与世长辞》等，通过音像资料知道胡适先生非常儒雅，很有大文化人的气质，他讲话的语速不快，

口齿清楚，斩钉截铁。我还买了台湾和大陆出版的《胡适传》、《四十自述》、《胡适图传》、《胡适评传》等书籍，又从潘家园的地摊上买来一本香港五十年代出版的《四十自述》，通过书籍了解了胡适先生多彩的传奇一生、气质风貌、为人处事等方面。我还与北京胡适研究会、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台湾胡适纪念馆取得了联系，他们都对我扮演胡适先生给予了肯定与鼓励，并邀请我参与学术研讨会、纪念活动，又给我提供了很多资料。我把胡适先生的图集、文章放在枕旁，每天都要看，感觉人物，通过阅读大量的资料，一个真实完整的胡适形象慢慢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这部戏中我出演北平和平解放前夕 56 岁的胡适，我从小处着手，一双鞋、一件长衫甚至一个手势动作都要认真琢磨，我从气质上有一点点接近胡适先生，但外型上并不是特别像，化妆师建议我把头发剃短，我的头发自从拍完《吴承恩与西游记》后一年多没有剃过，已经留得很长，并且我习惯留背头，但为了塑造人物的需要，我尊重化妆师的意见，剃成那个年代的发型，眉毛也做了处理，我自己还准备了一副金丝边的圆眼镜，但后来导演觉得不妥，那个年代的胡适应该戴玳瑁的眼镜，现在基本上是还原胡适先生那个年代的形象。看过资料后，我了解到胡适先生的骨髓里是中西文化有机的融合，胡适先生十几岁就出国留学，从 1927 年至 1959 年共获得三十六个博士头衔，我们在戏份不重的情况下也做了两种处理，当胡适先生与蒋介石、宋美龄、傅作义同时出现时穿西装，在其他场合时穿长衫、拿文明棍，从外形装束上给观众以深刻的印象。

尽管在这部戏中胡适的戏份不是很重，但在几场戏中要体现出胡适先生留给世人的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形象。我也希望通过几天的拍摄把胡适先生内心深处的情感真实的流露出来，把戏拍好。这部剧的导演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亮剑》、《和平年代》的导演张前，1 月 12 日我曾在重庆卫视的《中国剧风尚盛典》颁奖典礼上与张导相识，很荣幸这次能与张导合作，祝愿这部剧播出时能得到观众朋友的关注和喜爱。

我曾先后扮演过鲁迅先生、胡适先生两个文化名人，这是我从艺道路上的机遇与荣幸。我希望能有机会拍摄一部更翔实细致的展现胡适先生完整一生的影视作品，恰好前几天安徽的一位编剧给我发来了四十集电视连续剧《胡适》的剧本，我正在积极运作，希望根据我的条件把胡适先生最值得表现的部分演绎出来，尽快展现在银屏上，让海内外观众看到这个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做出贡献的人物的故事，也希望能专程去安徽绩溪参观胡适先生的故居。

3 月底，我有幸被国家宗教局中华宗教交流协会、中国佛教协会等主办方邀请去无锡、台北参加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会议期间日程排得很满，但我此次去台北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看胡适纪念馆和他的故居。4 月 1 日上午我受邀参加在台湾圆山大饭店召开的纪录电影《玄奘大师》台北发布会，会后顾不上吃饭与一

位台北的朋友驱车赶往距圆山饭店很远的胡适纪念馆，到达纪念馆后得知馆长临时有事外出，一位女性负责人接待了我们。胡适纪念馆由故居、陈列室和墓园三部分组成。故居是一层平房，白墙蓝窗，室内陈设保持胡适在世时的原貌。与故居相邻的陈列室，系一九六四年其美国友人吏带先生捐建，共展出胡适的情感世界、学术文化成就、胡适与近代中国、胡适与雷震四部分，及部分生前使用物品、文稿、信札等。我们在馆内仔细看了每一幅照片及遗物，我拿出在大陆买的台湾版《西游记考证》一书请纪念馆盖上纪念章，向负责人了解了一些胡适纪念馆的概况，之后我们又参观了墓园，临走前购买了纪念馆内正在出售的所有纪念品，包括茶杯、书签、拓片、铅笔、书籍等等。

通过这次参观我更加深了对胡适先生的认识和尊敬，同时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中更多的介绍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对中国文化艺术的贡献。

附：给章金莱先生的信

金莱先生：

收到大作《再现胡适》已经很久了，一直想写信给先生，只因近一个时期，为筹备纪念五四的会议和赶写几篇文章而耽搁下来，很觉抱歉，祈谅。

先生的文章内容很好，我们准备在下一期的《胡适研究通讯》上登出。不知先生有何意见。

先生在大作中说，您在扮演胡适的戏中，当胡适与蒋介石夫妇及傅作义在一起时，穿西装；其他时间穿长衫，拿文明棍。先生一定是看过不少资料，又经过认真考虑后，才有此打算的。不过，我还是愿意根据我对胡适先生的了解，冒昧地向您说出我的想法。据我了解，在1949年前，胡适在大陆时期，除非参加外国人组织的活动，胡适先生是从不穿西装的。到台湾后，情形略有变化，海岛的环境，开放程度较高，穿西服已成许多人的习惯。所以，凡遇比较正式的场合，胡适比较愿意穿西装。至于文明棍，这本来是一种没有实际用处，只是装装样子的东西。胡适是个很平民化的读书人，依他的性情，他不会喜欢这种装样子的东西。我至今还不曾看到一张胡适手持文明棍的照片。

因先生是对生活与艺术都十分忠诚的人，尽管尚未与先生见过面，我还是斗胆向先生贡献愚见。

不知先生曾否见过我编的《胡适及其友人》的照片集，尽管其中有个别说明文字存在错误，但这是目前收入胡适照片最多的一种书。倘先生有兴趣，我当请宋广波先生替我寄到府上。不过很不好意思，先生看过后，还须还给我。此书香

港商务印书馆于十年前出版，我手上只有这一本了。

倘先生不以为忤，我想把这封短信，附在大作之后，一起发表。

敬颂

时祺！

耿云志 敬上 2009.5.13.

张佛泉先生笔名考

张洪彬

随着胡适研究的逐步深入，与胡适交往较多的学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最具代表性成果的是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张佛泉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然而在当前学界，这个人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在大陆学界，张佛泉更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

《万象》第四卷第9期（2002年9月）刊载刘训练《张佛泉应该介绍一下》，刘训练先生读到张佛泉的代表作《自由与人权》，但是对张佛泉了解甚少，希望有人加以介绍。第四卷第12期（2002年12月）刊载了许纪霖《关于张佛泉》，鲲西《我听过张佛泉的课》二文，对张佛泉的生平有所介绍。许纪霖先生在这篇短文中较详细地介绍了张佛泉的生平，特别提到张佛泉在1930年代以“张佛泉”“佛泉”为名在《独立评论》《国闻周报》发表了约40篇文章。鲲西先生则回顾了西南联大时期听张佛泉先生的课的经历。谢泳在《万象》第5卷第2期（2003年2月）发表短文一篇《补说张佛泉》，指出在《今日评论》上有一篇张佛泉的文章，《论政治之制度化》，发表于《今日评论》第1卷第19期，1939年5月7日。

笔者在研究张佛泉思想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张佛泉有一个笔名，以及一大批资料为人所不知。张佛泉在《国难教育与教育目标》（载《国闻周报》第13卷第11期，1936年3月23日）一文中谈到，他从民国二十年（1931）起为大公报编《现代思潮》栏目。经查证，该栏目1931年9月4日创刊，每周五出刊一期，1931年12月19日开始移至周六出刊，每期占2/3个版面，收录2—5篇文章。1932年8月27日停刊，凡49期。未署编者名。在停刊前夕的1932年8月6日，《大公报》“现代思潮”第46期，载《本刊重要启事》一则：“编者远游，本刊

停版。八月底即完全结束。特此先行奉告读者。”“编者远游”，可以“导致本刊停版”，大致可以推测编者只有一人。果然，从1932年9月3日起，《大公报》每周六（1932年12月15日起改为周四）出刊《世界思潮》栏目，重新计期数，编者署名张申府。内容仍为哲学思潮，可以看作是《现代思潮》栏目的继承者。只是由于编者的变化，撰稿人队伍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之前最活跃的张抱横、张佛泉、张东荪、李安宅、张又亨、郭本道等人，被张季同、冯友兰（芝生）、张岱年、张申府、钱钟书（中书君）所取代。

“编者”远游到哪里去了呢？署名张佛泉的《中国教育基本问题——读国联教育专家之“中国教育改造”书后》，文末署“1933年5月3日写成于 John Hopkins”。《论国民政治负担》（《国闻周报》第10卷第33期，1933年8月21日），文末署“6月6日写成于 Baltimore”，John Hopkins 大学正是位于 Maryland 州的 Baltimore 市。张佛泉在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General Will”（台湾《政治学报》第30期，1998年）一文中提到“我的老师亚瑟·O. 洛夫乔伊 (Arthur O. Lovejoy)。”

据张佛泉在纪念崔书琴的文章《纪念亡友崔书琴先生》（载张其昀等著《崔书琴纪念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中回忆，1933年5月，张佛泉从 Baltimore 到 Cambridge 度夏。经过老同学齐致中的介绍认识了崔书琴（其时，崔已经在哈佛大学研究院读了三年，正在提交博士论文），自此结下友谊。后来在回国后，张佛泉与崔书琴同供职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抗战初期又随校辗转远赴长沙、昆明。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迁回北平，因为经济凋敝，《独立评论》复刊已无希望。但是为了发表言论，胡适、张佛泉、崔书琴等人成立了“独立时论社”，张佛泉、王聿修、崔书琴任干事，社址设在景山东街路南东老胡同内崔书琴家里。1947年夏天，张佛泉与崔书琴等人在北平成立“市民自治促进会”。1949年，与毛子水、崔书琴、王聿修、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人一起筹办《自由中国》半月刊。

张佛泉《国闻周报》上发表的《民元以来我国在政制上的传统错误》（载《国闻周报》第10卷第44期，1933年11月6日），文末署“9月写成于 Cambridge”，其时张佛泉正在哈佛大学度夏。胡适读到此文，大为赞赏，看到文末署为麻州剑桥 (Cambridge Mass.)，以为他是就读于哈佛大学的学生，于是写信给美国的朋友，要求代访此人。自此张佛泉进入胡适的视野，1934年初秋，张佛泉应胡适邀请，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并自此进入《独立评论》撰稿人群体。

另，《攻下“孔家店”之后》（载《大公报》“现代思潮”第8期，1931年10月23日），文末署“十月四日编者”，而在另一篇署名“佛泉”的文章《关于新道德的商榷》（载《大公报》“现代思潮”第14期，1931年12月19日）中，作

者说，“在《攻下孔家店》一文上，我曾大胆地说……”。这里确定“编者”和“佛泉”是同一个人。笔者视野所及，在近代中国，以佛泉为名的知名学者仅张佛泉一人。

由此可以确定，《现代思潮》的编者正是张佛泉。

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及的张抱横正是张佛泉，这是鲜为人所知的。在《现代思潮》栏目中，署名“张抱横”的文章占相当大部分，署名“佛泉”的文章也不少。在《现代思潮》栏目首期的一篇署名黄子邕的文章《我对于现代思潮的期望》中，开篇就提到“近来张葆恒先生还有他的几位朋友常对我谈起……”，这有助于推测“张抱横”就是“张葆恒”的谐音笔名，即张抱横就是张葆恒。而在台湾东吴大学张佛泉人权研究中心的网站上，有介绍“张佛泉，学名葆恒”。我怀疑这是“葆恒”之误，或者张葆恒本身也只是一个谐音于其学名“葆恒”的笔名，即张抱横、张葆恒、张葆桓、张佛泉正是同一个人。这种推断还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树立一个新道德——以“活着意即在超生活”为基本口号》（载《大公报》“现代思潮”第9期，1931年10月30日），署名“张抱横”，《何谓“生活意即在超生活”》（载《大公报》“现代思潮”第10期，1931年11月6日），则署名“佛泉”，后文对前文的中心概念做出解释，开篇就谈到：“在上一期新道德运动专号中，我们曾说以‘生活意即在超生活’为口号……”。由此可以确定，“张抱横”和“佛泉”是同一个人。

另一条证据则来自于张耀南《西方文化之输入不能不以哲学为先导》（张东荪著，张耀南编《西洋哲学：张东荪讲西洋哲学》，东方出版社，2007）。该文提到：“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四日，《大公报》之‘现代思潮’专栏创刊，周刊，主编张抱横先生。东荪先生是这一专栏的积极支持者。为什么？除了他跟张抱横先生是朋友关系外，还因为这个专栏是专以输入‘西洋哲学’为职志的，完全合乎东荪先生一贯的‘哲学主义’立场、‘费先生’立场。”如果“编者”确实就是“张抱横”，那么“张佛泉”就是“张抱横”。事实上，《现代思潮》栏目确实发表了不少张东荪的文章，而且署名张抱横的《哲学与近代科学》（世界书局，1934年3月；台湾启明书局1961年、1999年再版），署由“张东荪校阅”；张东荪编《唯物辩证法论战：辩证法唯物论批判》（民友书局，1934）中收有《黑格尔与马克思之辩证法》一篇，署名张抱横。可见张抱横和张东荪关系比较密切。

通读《现代思潮》栏目的署名“编者”或者“张抱横”的文章，很容易发现和后来以“佛泉”“张佛泉”为名在《国闻周报》《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在论题和论旨上一脉相承。比如署名“编者”的《发刊词》中，作者谈到，几十年来中国对西洋文化的适应，分析起来有两个时期，一是模仿皮毛的自然科学时期，学的尽是西洋的枪炮火车，二是模仿皮毛的社会科学时期，抄袭外国的制度和各

种主义。然而，作者认为，这样并不奏效，“现在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也许是最后最澈底的一条路——就是要抓住西洋人的思想，西洋人的灵魂：西洋人的哲学！”这与张佛泉后来提出的“从根上西化”的主张，如出一辙。

也许还能从张佛泉的好友的文章或者日记、书信中找到更强的根据，但是，通过以上证据的论证，我认为已经基本可以确定：“张佛泉”“佛泉”“张抱横”“张葆恒”“张葆桓”，以及《现代思潮》栏目的“编者”就是同一个人。以此为线索，我们可以确定《大公报·现代思潮》栏目中一大批署名“张抱横”、“编者”的文章确实出自张佛泉之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来。

除此之外，张佛泉在《大公报》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由于《大公报》的“社评”栏实行不署名制，要确定哪些是张佛泉所做就比较难，目前能做到的就只能是根据张佛泉在其他文章中提及的，顺藤摸瓜找出一些。我们可以确定如下文章为张佛泉所做：

《杜威教育思想及中国教育前途》，《大公报》，1933年1月31日，署名张佛泉。

《立法院将审查宪稿批评》（社评），《大公报》1934年6月1日，未署名，据《建国与政制问题》确定为张佛泉所作；

《经济复兴与美政变革》（社评），《大公报》1934年6月23日，未署名，据《建国与政制问题》确定为张佛泉所作；

《全国考铨会议今日开会》（社论），《大公报》1934年11月1日。信息来源于《考铨制度亟应树立》；

《卑勿高的行政改革论》（社评），《大公报》1935年2月15日。信息来源于《考铨制度与行政效率》；

《行政整理与厉行考绩》（社评），《大公报》1935年5月7日。信息来源于《考铨制度与行政效率》；

《由减缩政费到行政改造》（社评），《大公报》1935年5月16日。信息来源于《考铨制度与行政效率》。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是，张佛泉似乎曾师事张君勱，在张佛泉写给《再生》杂志主编张君勱的一封信《邦国哲学的创造》中（《再生》第1卷第11期，1933年3月20日），称谓是“君勱吾师”。不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师生关系，我们尚待进一步的资料发掘来证实。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6级硕士生）

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智效民

一、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胡适正陪同杜威先生在上海访问，同行的还有杜威的学生、北京大学教务长蒋梦麟先生。当时他们对北京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两天后才通过报纸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文章——《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这篇文章由胡适起草，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运动的初步反思。

文章说，五四运动之前，他们只是想通过杜威的访问，在思想上提倡科学精神，在教育上输入新鲜理论，“不料事势的变化大出我们的意料”，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对于这个运动，胡适认为至少有五大成效：一是加强了学生主动负责的精神，二是激发了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三是丰富了学生团体生活的经验，四是培养了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五是提高了学生追求知识的欲望。文章指出：“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效应。

与此同时，该文对五四运动也提出批评。文章认为，以罢课为武器进行斗争，对敌人毫无损害，对学生却有三大危害：第一，在学生运动中，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却躲在人群中呐喊，从而助长了依赖群众的懦夫心理。第二，罢课时间一长，有些人就会养成逃课的习惯。第三，经过这场运动，有些人可能养成盲目从众的行为模式。

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对学生运动予以充分肯定。文章强调，五四运动“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正因为如此，文章对办教育的人提出如下忠告：“不要梦想压制学生运动，学潮的救济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引导学生向着有益的路上去……”。

所谓“有益的路”，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注重求知、调查、改革和自修的“学问生活”；二是既尊重自己的主张、又能容纳反对党意见的“团体生活”；三力所能及的“社会服务生活”。正因为如此，文章对学生也提出如下忠告：“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学生运动如果要想保存五四和六三的光荣，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改变活动的方向，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学校内外有益有用的学生活动上去。”

作为学生的师长，胡适和蒋梦麟还告诉大家：学生运动不是常态社会的行为模式，而是变态社会的必然产物。所谓常态社会，是一个比较清明、由成年人管

理政治的社会。如果成年人不能尽职尽责，不能治理政府的腐败，那就是一个变态的社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于是，本来应该安心读书的学生只好放下书本，走出校园，冒着生命危险去游行请愿，从而酿成大规模学生运动。因此他们在文章中说：“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胡适全集》第21卷，第219-22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二、一个最正确的公式

五四运动以后，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领袖先后出国留学。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又投入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运动。1928年5月4日，正当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北洋政府即将垮台的时候，胡适应邀去上海光华大学发表演说。当时胡适已经离开北大，担任了中国公学的校长。中国公学位于上海吴淞口，是胡适的母校，因此他对这所学校感情很深。胡适最担心的事情就把五四运动当成一个空洞的口号，再加上台下的大学生在五四运动时年龄尚小，因此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五四运动的背景和经过，然后再分析它的影响和意义。胡适认为，五四运动除直接导致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最终解决了“山东问题”外，其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过去的学生只顾读书，不管闲事。五四运动使他们对社会政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第二，为了参加运动，学生都组织了自己的社团，并创办了各自的出版物。这对新文学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第三，为了让普通老百姓关心政治，读书看报，许多学校都创办了平民学堂，使平民教育得到很大进步。

第四，中国劳工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并与学生运动遥相呼应。

第五，妇女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从而形成了妇女解放的洪流。

第六，各个政党都非常注意吸收青年为自己的骨干。为了给他们开辟言论阵地，报纸副刊也由过去的“捧捧戏子，抬抬妓女”，改变为谈论“马克思、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名词”了。

在此基础上，胡适再次强调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产物。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把这个观点总结成一个历史公式，并且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为了证明这个历史公式，胡适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北宋末年的陈东上书、清朝末年的戊戌政变、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例，得出如下结论：“政治腐化，至于极点，倡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亦唯此种热烈青年运动，革命事业，都有成功之一日”。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种民意机构存在，那么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就可以安心读书；他们的兴趣，就可以是体育比赛、跳舞看戏、谈情说爱了。胡适认为，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证明上述公式正确无误。

值得一提的是，在演讲结束的时候，胡适还充满感情地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是不曾放弃自己的责任，总是不断与恶势力作斗争。为此，“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他们的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他还说：“例如前几天报上揭载武汉地方，有二百余共产党员，同时受戮，查其年龄，几皆在二十五岁以下，且大多数为青年女子。照人道来讲，他们应该处处受社会的保障，他们的意志，尚未成熟，他们的行动，自己不负责任，故在外国，偶遇少年犯罪，法官另外优待，减刑一等，以示宽惠。中国的青年，如此牺牲，实在太大了！”（同上，第363-373页）

三、为个人主义正名

1935年是五四运动16周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纪念五四》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仍然向往常一样首先回顾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并披露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蔡元培有直接关系。

文章说，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后来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最初也是以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为主，并且有意不谈政治，从而把思想革命限制在学术文化领域。但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之后，北京各学校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的伟大胜利。整个北京就像陈独秀所说：“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

由于蔡元培当时是主张中国参战的，因此当胜利来到的时候，他的“兴致最高”。于是他约请教授们在天安门组织了演讲大会，“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这样一来，就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系，大体上梳理清楚了。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正是日寇向华北步步紧逼，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形势，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大问题。由于胡适在文章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所以当他看到张奚若在《大公报》发表纪念五四的

文章后，“很受感动”。

张奚若早年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当时是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文的标题是《国民人格之培养》。当时是不能直接谈论抗日问题的，因此张先生只能从培养国民人格的角度入手，剖析问题的要害之所在。

文章首先指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由于当时的领导人只知道民主政治的形式，并不了解其精髓，所以他们只是抄袭模仿了一些民主政治的皮毛而已。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大家才渐渐认识到欧美民主政治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个人的解放。

紧接着，张奚若从专业的角度指出，个人主义政治哲学的精髓有三点：第一，承认政治是非的最终判断者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或政府；第二，承认个人有批评政府的权力；第三，承认个人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张先生强调：当一个人拥有这些权力之后，“他才能觉得他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他才能感觉他做人的尊严和价值，他才能真爱护他的国家。”

在此基础上，张先生又进一步指出，尽管个人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有许多缺陷和流弊，但由于“救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惟有伟大人格者才能胜任”，而个人主义恰恰可以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所以只要不是有意与人民为敌的政体，就应该尊重个人主义。遗憾的是，我们的政府却不懂这个道理，总是想统一思想，铲除反动，从而白白“丧失了许多有志气有能力的好国民真人格”，这实在是很痛心的事。（《张奚若文集》第 354-358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在张奚若影响下，胡适又写了一篇的文章，标题是“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他说：“张先生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他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一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为我主义”，即假个人主义；二是有独立思想、只认真理不计利害的“个性主义”，即真正的个人主义。胡适还说：“……一些人嘲笑这种个人主义，笑它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时思想。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马克思（马克思）、恩格尔（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我们如何配嘲笑维多利亚时代呢！”（《胡适全集》第 22 卷，第 285 页）

胡适文章发表后，张奚若又写了《再论国民人格》。文章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只是家族的一分子，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这种情况到五四运动以后才大大改变。但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刚刚“萌芽的个人解放与人格培养”，

在政府的严厉制裁下又日见消沉。于是，人们还没有脱离家庭束缚，又被压在国家的大帽子底下。再加上国家比家庭的权威要大得多，因此，“国家（其实就是政府）高于一切，绝对服从，无条件的拥护，思想要统一，行为要纪律化，批评是反动，不赞成是叛逆，全国的人最好都变成接受命令的机械，社会才能进步”云云，便成了整个社会的金科玉律，任何人不得违背。

张奚若毕竟是著名政治学家。他指出：由于政府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因此它不会不犯错误。再加上权力的诱惑，就更容易日趋腐败。防治的办法，除了“不见得一定有效”的分权之外，“最重要的一种”，就是通过舆论监督，使政府能够“接受批评容纳意见”。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培养明辨是非、敢于负责的独立的人格。（《张奚若文集》，第 259-263 页）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提倡用个人主义来培养国民人格的缘故。

四、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1947 年五四运动 28 周年之际，胡适为《大公报》写了纪念五四的“星期论文”。我注意到，胡适每当论及五四运动，都要提到孙中山的一段议论，这篇文章也不例外。这段议论是孙中山在 1920 年 1 月给海外同志的写信时提到的。当时距五四运动虽然只有八个月，但是在涉及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时，却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这段文字不长，也容易理解，故照录于下：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界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撻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界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这里所谓“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与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有密切关系。因此胡适指出：“孙中山先生的评判是很正确很公允的。五四运动在两个月之中，轰动了全国的青年，解放了全国青年的思想，把白话文变成了全国青年达意表情的新工具，使多数青年感觉用文字来自由发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不是极少数古文家专利的事，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的永久的历史意义。”

（《胡适全集》第 22 卷，第 672 页）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人以为白话文淡如白水，

不如文言文高雅古奥，耐人玩味。殊不知白话文运动的最大作用，就在于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而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又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在此期间，胡适还分别在北大学生“五四”筹备会举行的晚会和北大校友聚餐会上发表讲话。他说：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罪案》中“提出两点，即拥护科学与拥护民主。因拥护科学而反对孔教、反对旧思想；因拥护民主，而反对专制，反对独裁。这就是《新青年》的两大罪案，也就是新思潮运动的原因。”（同上，第 675 页）至于新思潮的意义，他认为是一种批评评判的态度与精神，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念。

我以为，只有联系张奚若所谓个人是“政治是非最终判断者”的理论，才能对胡适的论述有进一步认识和体会。

澄衷学堂时期胡适所受的公民训练

张书克

一

胡适于 1905 年（光绪乙巳年）进入上海澄衷学堂求学，第二年夏天离开，在澄衷学堂待的时间不长，大约一年有半。澄衷共有十二个班，课堂分东西两排，最高一班称为东一斋，第二班为西一斋，以下直到西六斋。那时候还没有严格规定的学制，也没有什么中学、小学的分别。用现在的名称来分，前六班可算为中学，其余六班为小学。一开始，胡适进的是东三斋，相当于初中二年级，下半年升入东二斋，相当于高中一年级，第二年又升入西一斋，也就是高中二年级了。

极为难得的是，在澄衷学堂时期，胡适给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也是他存世的最早的日记。日记从光绪丙午年正月二十日（1906 年 2 月 13 日）开始，至同年六月六日（7 月 26 日）为止，共 90 余篇。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非常珍贵，它为我们了解胡适的成长过程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

我在读胡适《澄衷日记》时发现，胡适多次提到一本名为《国民读本》（*Citizen Reader*）的书。书是西洋人 Arnold Jorster 写的，大概是澄衷学堂直接拿来作为教科书用的，当然也有可能是胡适自己买来看的。该书大体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读本》或者《公民》教科书。

胡适对这本书极为重视，也颇为爱读。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本书对胡

适今后的人格养成和社会活动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胡适在光绪丙午年三月二十一日（本文以下日期皆用阴历）的日记中这样说道：“《国民读本》（*Citizen Reader*）一书，其于国家政治（法）律，以及成人之道、自治治人之理，皆推阐无遗，其中哲言法语足为座右铭者，不可胜数。”胡适并且翻译了其中的两条格言：(a) To rule oneself is the first step to being able to rule other.（自治者乃治人之第一着手处也。）(b) We shall do not injustice to others nor suffer injustice ourselves.（毋以不义加[诸]人，亦毋受人不义之加诸我。）胡适还把上述格言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我亦欲毋加诸人”的思想作了联系。

在此前三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胡适还节译了《国民读本》中论选举(voting)的一段，修正了自己关于选举的误解（以为选举随众人之意向而举之，不必被选者之知之；又以为被选者苟自陈欲被选之意于举人者之前，则将跻于钻营者之列）。胡适翻译的这一段，叙述的是秘密投票(Ballot)的程序。胡适一生重视选举制度、赞扬无记名投票，不能不说和他早年读的《国民读本》有很大关系。

四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胡适摘译了《国民读本》所论法律之公例六条：

1、Everyone is equal before the law.（凡人对于法律皆平等。）

2、Every man is held to be innocent until he is proved to be guilty.
（凡人未为他人证其有罪之前，皆当以无辜待之。）

3、No one can be tried twice for the same offence.（同一罪名不能经二次之裁制。）

4、All courts of justice are open to the public.（公堂皆洞开，恣人观审。）

5、No one is a judge in his own cause.（凡人不能裁制关切己身之讼事。）

6、No one has the right to take the law in his own hands.（法律不能以一人私之。）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一罪不二罚”、“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等法律原则。这些法律原则，是文明社会中每个公民应当知道的常识。

二

读书之余，胡适还频繁地参加各种社团活动。

根据统计，胡适澄衷时期的90多篇日记中，涉及社团活动的有50篇左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胡适平均每两天参加一次重要的社团活动。这些

活动有校内本班的，有低年级班的，也有兄弟学校的，甚至还有社会上的。

胡适参加的社团可谓多矣。有“阅书社”，“讲书会”，“算学研究会”，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自治会”，“集益会”。

“自治会”即“学生自治会”，是学校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学生会”（“学生会”这个简称等于把最重要的两个字给省略掉了）。胡适积极参加“自治会”的活动，在同班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自治会”选举职员时，胡适以18票被选为会长。

胡适所在的西一斋“自治会”成立后，其他班级也相继成立了“东二自治”、“西二励学”、“东三自治”等各会。因此胡适后来说：“我在澄衷的第二年，发起各斋组织‘自治会’”。

所谓集益会，顾名思义，大概即集思广益会，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座谈会或者交流会。胡适三月二十日的日记，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一次集益会的情况。会上有讲文字学的，演说“泰丕”二字的意义，有讲时事的，演说南昌教案，还有演说光学和算术的。

社团活动离不开演讲。四月初六日，“自治会”开会时，胡适演说三事：“释治字之意”、“论同学宜于学问上德性上着力竞争”、“论选举时被选者及选人者之权利义务”。闰四月十九日，“自治会”开会时，胡适演讲“慎独”、“交际之要素”。

在《四十自述》中，胡适还记述了他在“自治会”颇为得意的一次演讲。这次演说的题目是“论性”。他驳孟子性善的主张，也不赞成荀子的性恶说。他承认王阳明的性“无善无恶，可善可恶”是对的。他那时正读英文的《格致读本》，懂得了一点点最浅近的科学知识，就搬出来应用。孟子曾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胡适说：孟子不懂得科学（格致），不知道水有保持水平的道理，也不知道地心吸力的道理。“水无有不下”，并非水性向下，只是地心吸力引它向下。吸力可以引它向下，高高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来水管里的水向上。水无上无下，只保持它的水平，却又可上可下，正像人性本无善无恶，却又可善可恶。这篇“性论”很受同学的欢迎，他也很得意，以为真用科学证明了告子、王阳明的性论了。

除了参加学校内的活动外，胡适还把触角伸向了校外，初步显露了他爱管闲事的性格。

当时，旅沪安徽人士筹划成立安徽旅沪学会。胡适对旅沪学会章程甚不满意，因此作一驳议，寄给方守六及发起诸人。该信长三千言，其要点是：先就学界入手，不掺他界；各校代表人不可废，且必兼纠察之职；学界外，各业各举一代表，每次与会旁听；纠察有名无实，可废去；当注意调查；会计一职当设，不得由书

记兼任。

后来，旅沪学会由方守六提议，每县各举代表一人。胡适也“甚不表同情”，因此又作书与之辩论，力言不必举、不能举的理由，并提议学界、商界二界宜作分别。

方守六给胡适回信，对胡适的观点表示认同，并约他一晤。

二人见面后，方守六勉励胡适须学演说，胡适听取了该意见。至于胡适所言代表一事，方守六说“吾侪亦是敷衍”。胡适听后感慨地说：“呜呼，此等人可与办事耶？”

当时，胡适才 14 岁；而方守六，则是《大公报》创刊后的第一任主笔。

三

胡适最主要的社会身份是学者，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另外，胡适又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喜欢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发表议论，喜欢参加社会活动。这样的人，我们通常称之为社会活动家。

我更愿意用“公民”来称呼胡适。在我看来，很多时候，胡适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往往是基于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心。正是因为把自己看作一个公民，胡适经常忍不住要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正是因为把自己看作一个公民，胡适才对政治怀有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既不远离政治，患上政治冷漠症，又不离政治太近，以至于“当局者迷”，而是始终保持恰当的距离，不温不火，不急不躁。

因此，在我看来，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难得的一个合格公民，同时也是一个难得的公民教员。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想要把自己培养成合格公民，不妨从胡适身上学习一些东西。

基于上面的原因，我想写一个系列，就叫做《公民胡适》，重点关注作为公民的胡适的所作所为，看看他是如何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的，又是如何对待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职责的。

胡适不是一生下来就成为合格公民的。它需要一个过程，一个慢慢的学习和训练的过程。本文关注的就是他在澄衷学堂时期所受的公民训练（我们可不要忘了，那可是在大清帝国的时期）。至于他以后所受的公民训练和作为公民的所作所为，我们且待下文分解。

2007 年胡适研究论文索引

宋广波整理

1. 解析胡适的翻译思想 陈吉荣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7-09-25
2. 文学语言观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以胡适和老舍为中心 刘东方; 宋益乔 中国文学研究 2007-07-31
3. 胡适及其书法 李建森 小说评论 2007-09-20
4. 误将宽容做容忍 邓文初 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 2007-10-10
5. 20 世纪 50 年代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历史缘起 郑崇玲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7-09-10
6. 胡适的学人传记三论 韩波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07-08-15
7. 从“白话语词入诗”到“诗体大解放”——胡适新诗主张的形式问题分析 黎志敏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7-10-01
8. 执子之手,与谁偕老——试比较《终身大事》与《伤逝》思想内涵的异同 郭运恒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7-08-26
9. 胡适哲学之路:一种新视域解读 高永强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7-08-20
10. 试论学衡派对胡适的批判 许国蕊; 李小辉 湘潮(下半月)(理论) 2007-07-25
11. 论胡适的青年观 杨琳 学海 2007-09-20
12. “救出自己”不等于为我主义——从胡适对《玩偶之家》的阐释说起 李定清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9-15
13. 鲁迅与胡适传统文化背景之比较 孙昌松; 程春艳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07-15
14. 胡适:在文学改良的理论与实践之间 孙郁 中国图书评论 2007-09-10
15. 为林琴南一辩——“方姚卒不之陪”析 程巍 中国图书评论 2007-09-10
16. 胡适自由权科学思想初探 仇婷婷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09-01
17. 胡适“第一次访女生宿舍” 邵建 书屋 2007-10-06
18. 权利的个人如何确立 顾红亮 重庆社会科学 2007-09-15
19. 试论胡适的科学教育思想 曲铁华; 朱永坤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10-25
20. 再论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 谢志军; 牛建军 党史博采(理论) 2007-09-20
21. 现代品格的多面性与自我调适——对梁、胡文化论战的一种理解 罗义华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09-25

22. 论胡适的章回小说研究 张蕾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9-30
23. 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视角看胡适与鲁迅 耿云志 鲁迅研究月刊
2007-10-20
24. 青年陈之藩与胡适 严飞 书城 2007-11-05
25. 论译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规范 冯晓凌 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7-10-01
26. 演义与历史小说——传统演义的现代转化 闫立飞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9-15
27. 张竞生的文化气魄 陈远 同舟共进 2007-11-01
28. “五四”文化语境下《玩偶之家》的多元阐释 李定清 襄樊学院学报
2007-06-15
29. 胡适使美业绩制约因素考察 史义银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10-25
30. 邀请胡适到商务印书馆的应是高梦旦 李文倩 读书 2007-11-15
31. 试论胡适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马德坤 理论界 2007-11-15
32. 理论先行的后遗症——再谈胡适及其白话新诗理论 吴颖 理论界
2007-11-15
33. 用心亲近台湾(连载) 胡公展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7-10-15
0 6
34. 《淮南子·要略》与近世章胡诸子学论争 马育良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7-07-15
35. “这也可能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倒退”——北伐时期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
邵建 开放时代 2007-11-10
36. 胡适与图书馆 李巧玲 兰台世界 2007-11-15
37. 检读胡适 邵建 书屋 2007-12-06
38. 梦中谈梦倍酸辛——陈寅恪七言律诗三首笺议 沈治钧 红楼梦学刊
2007-11-15
39. 现代学术批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影响——以 20 世纪 50 年代胡适思想批判为个案 李方祥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7-11-25
40. 胡适与民国时期安徽大学的初创 周乾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11-15
41. 析胡适“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 吴麟 国际新闻界 2007-11-15
42. 五卅运动中的胡适 邵建 粤海风 2007-11-15
43. 从黎昔非的命运看胡适性格的另一面 眉睫 粤海风 2007-11-15
44. 《淮南子·要略》与近世章、胡诸子学论争 马育良 中华文化论坛
2007-10-25
45. 论胡适与乾嘉考据学派 房列曙; 吴云峰 安徽史学 2007-11-15

46. 读胡适日记札记(之一) 朱正 博览群书 2007-11-15
47. 胡适的新年梦想和期望 智效民 民主与科学 2007-12-15
48. 现代与传统的转向——胡适与古史辨运动 代正; 陈卫宗 湘潮(下半月)(理论) 2007-11-25
49. 西化派的纷争——20世纪30年代的西化派思想简析 鞠巍; 申淑华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7-12-15
50. 试论胡适早期政治哲学思想的特色 方蒙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11-30
51. 略论胡适的自传理论及其实践 徐琼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7-11-15
52. 论《独立评论》的另一个核心——黎昔非主持的发行所 马寒梅 北京社会科学 2007-12-15
53. 浅谈胡适治学方法论形成的文化取向 白利芬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7-11-20
54. 论胡适的编辑实践与思想理路 刘敏慧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11-30
55. “怎样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关于“信心与反省”的讨论及其他 张勇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11-15
56. 再造与复古的辩难:整理国故与文化复古之关系的历史考察 王存奎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10-15
57. 从胡适对古典诗词的评介看他的修辞观 黄健 湘南学院学报 2007-12-25
58. 富有“创造的思想力”的文学观——评胡适《白话文学史》 金鹏善 阴山学刊 2007-12-15
59. 读胡适日记札记(之二) 朱正 博览群书 2007-12-15
60. 论胡适在《新青年》的戏剧改良理论 杨迎平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7-11-08
61. 胡适与戏曲 刘恒 戏剧文学 2007-12-10
62. 批判与接受:鲁迅与胡适对梅兰芳的文化选择 王志蔚 学术探索 2007-12-15
63. 胡适、茅盾的“徐志摩论”比较 李丹 学术月刊 2007-10-20
64. 浅析胡适的自由主义编辑思想 周亚孟; 黄金刚 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12-25
65. 胡适与文学革命 惠卫阳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7-09-15
66. 胡适婚姻的两难抉择——兼谈胡适之母对他的影响 李军平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7-05-25

67. 横看成岭侧成峰——近五十年来台湾“红学”印象 胡文彬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2-15
68. 胡适与金钱 陈新 书屋 2007-01-06
69. 两种选择:“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与胡适——“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李大钊与胡适关系探析 刘志光 中共党史研究 2007-01-10
70. 胡适的语言观 姜红 安徽史学 2007-01-15
71. 浅析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 杨希希 安徽农学通报 2007-01-10
72. 故乡·母亲·胡适 张哲 中国电子商务 2007-02-05
73. “簪红室藏本”和一段旧公案——《红楼梦》120回抄本系列研究之一 夏薇 红楼梦学刊 2007-01-15
74. 充满悲剧的突围 蒋书丽 文学自由谈 2007-01-27
75.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适的几封英文信 王邦维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3-20
76. 胡适与《鲁迅全集》 李子展 出版史料 2007-03-25
77. 胡适的婚恋故事 方纯杰 党史天地 2007-03-15
78. 哲学需要方法的革命——从胡适治学与方法论的关系看 魏航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2-25
79. 胡适何如人——以黎昔非个案为中心 王炜民 江汉论坛 2007-02-15
80. 立场观念的较量——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鲁迅二人与胡适的一次交锋 姜建 江西社会科学 2007-02-25
81. 胡适论“活的文学”——民间文学之文学性探析 刘波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3-10
82. 一件胡适先生发现而未解的红学迷案试解——甲戌本《石头记》跋语错序探研 徐乃为 学术界 2007-01-30
83. 《童年》和《童年忆往》 吴静 图书馆杂志 2007-02-15
84. 鲁迅缘何批评胡适?——一个思想史的梳理 郝庆军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7-03-24
85. 梅光迪年谱简编 段怀清 新文学史料 2007-02-22
86. 北大竟有如此说胡适的书——关于《翦伯赞传》的一点非议 黄波 粤海风 2007-01-15
87. 胡适的白话诗 王传生 咬文嚼字 2007-03-01
88. 论“五四”时期的文言一致 陈占彪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2-28
89. 越是时代的就越永恒:梁启超文本的跨世纪解读——评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 罗志田 中国图书评论 2007-02-10
90. 胡适实验主义治学方法的运用——以胡适对《红楼梦》的考证为例 胡琴

91. 胡适、鲁迅与“五四”白话散文 王瑞; 张卫波 北京社会科学 2007-04-15
92. 慧眼识珠启宝藏 大师谈心遗佳酿——写于《胡适王重民书信集》问世前
王锦贵 图书与情报 2007-04-30
93. 论胡适的文化救国论 邱浙闻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1-15
94. 胡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张玉菡 党史文苑 2007-02-10
95. 胡适的社会主题 郑万鹏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7-03-28
96. 中国新文学初期的理论建构——试论鲁迅与胡适的文学观 郭运恒 河南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1-10
97. 胡适在《努力》时期的“联邦论” 邵建 开放时代 2007-03-10
98. 论胡适文学革命的“语言”逻辑起点 郭小英 兰州学刊 2007-03-30
99. 论鲁迅与胡适基础教育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吕文玲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7-03-16
100. 晚年胡适的知人论世 唐小兵 南风窗 2007-01-01
101. 胡适上海求学时期思想探析 任宗璞; 王维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3-20
102.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论胡适“五四”时期的戏剧戏曲观念 安凌 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7-03-30
103. 瞿秋白批胡适疏解 胡明 粤海风 2007-03-15
104. 胡适白话文学理论与白话文学实践的错位 泓峻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07-04-15
105. 梁启超与胡适年谱思想之比较 刘佰合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1-30
106. 从胡适家书看胡适夫妇 秦诤 百年潮 2007-05-04
107. 浅析胡适的自由主义编辑思想 周亚孟; 黄金刚 保山师专学报
2007-01-15
108. 试论《独立评论》周刊的民族主义思想 齐辉 重庆社会科学 2007-04-15
109.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胡适 唐健禾; 刘川 当代文坛 2007-05-15
110. 五四时期胡适的中西文化观述评 禹红梅; 汤秀丽 法制与社会
2007-03-30
111. 胡适的五四观 盛菊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4-25
112. 胡适与绩溪县知事李懋延的斗争 吴元康 江淮文史 2007-05-01
113. 胡适的白话文学观与“五四”文学理念的建构 张红红 江苏教育学院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07-03-25

- 114.建构中国新文化不可或缺的方法论——解读胡适的实验主义观 朱德发
理论学刊 2007-04-15
- 115.浅析胡适文人气质与政治人格的冲突 张大鹏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报 2007-02-28
- 116.胡适被开除出“同盟”的真相 刘晓滇;刘小清 文史春秋 2007-03-10
- 117.20世纪初子学的复兴及其影响 张利 许昌学院学报 2007-01-30
- 118.胡适家书中关于江冬秀的几件事 李致;孙胜存 新文学史料
2007-05-22
- 119.胡适的佚信以及关于白话新诗的一场笔战 钦鸿 新文学史料
2007-05-22
- 120.胡适档案文献编纂思想探析 刘晓蓓 云南档案 2007-04-20
- 121.胡适与张君勱的自由主义比较 张振国 政法论坛 2007-03-15
- 122.胡适文学改良主张中三个尚待澄清的问题 段怀清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 2007-05-10
- 123.陈独秀与胡适科学观之比较——兼论“五四”的“唯科学主义”问题 徐
亚东 中州学刊 2007-05-10
- 124.胡适人权思想内涵及现代意义 韦长发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5-25
- 125.《懋斋诗钞》·周汝昌·胡适 淮茗 博览群书 2007-04-15
- 126.胡适的词学研究与新诗运动 聂安福 长江学术 2007-04-15
- 127.在明白和晦涩之间的新诗 刘慧 长江学术 2007-04-15
- 128.上海市档案馆所藏一封胡适佚札 柳和城 档案春秋 2007-06-10
- 129.评胡适与南社的白话诗词之争 汪梦川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2007-03-08
- 130.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如文 文史博览 2007-06-05
- 131.简析20世纪20年代胡适的国家统一主张 鲍和平 民国档案 2007-05-25
- 132.论胡适文艺思想的三大矛盾 庄锡华 江苏社会科学 2007-05-15
- 133.任是无情也动人——胡适与无锡才女徐芳的如烟往事 尤岩 江苏地方志
2007-06-10
- 134.158 胡适史料拾遗续编(上) 吴元康 历史档案 2007-05-15
- 135.《新青年》开辟“易卜生号”之探究 李启彩;田晓燕 前沿 2007-04-15
- 136.高宗武华盛顿隐居遗事(二)——傅斯年的斥骂引出的一段故事 夏侯叙五
书屋 2007-06-06
- 137.胡鲁眼中的尼采 邵建 书屋 2007-06-06
- 138.鲁迅与胡适文学作品论异同浅析 郭运恒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07-05-15
- 139.思想的承继:李敖与胡适 王刚 探索与争鸣 2007-06-15

- 140.胡适有钱吗? 陈新 招商周刊 2007-04-16
- 141.要把金针度与人——胡适与王重民论《水经注》 蔡登山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7-07-15
- 142.胡适对韩国文学家的影响 裴开花 当代韩国 2007-06-15
- 143.胡适之大学理念 刘青汉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7-10
- 144.甲戌本石头记论略 任晓辉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5-30
- 145.五四时期人言人殊的“平民文学” 童龙超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5-25
- 146.试述胡适国文教学思想的当代启示 蒋丽华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03-15
- 147.胡适与吴国桢:谁在说谎? 魏邦良 开放时代 2007-05-10
- 148.朦胧的、不确定的救国理念——“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新式知识精英的初步反应 左双文; 陈伟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7-05-30
- 149.为宪政与自由而一搏的晚年胡适 蔡波; 余博 兰台世界 2007-07-01
- 150.思想的胎孕:沪学时代的胡适 邵建 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 2007-06-10
- 151.论胡适现代文体理论的文学史意义 刘东方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7-08-15
- 152.胡适思想 2005 年研究综述 李明 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06-15
- 153.胡适确曾为梅兰芳选戏 苏育生 中国京剧 2007-08-01
- 154.教我如何不想他——赵元任和杨步伟 张昌华 江淮文史 2007-07-01
- 155.青年毛泽东与胡适 赵映林 文史杂志 2007-07-05
- 156.从《镜花缘的引论》等文看胡适的妇女观 朱文华; 孟晖 晋阳学刊 2007-07-25
- 157.全球语境中文化诠释的歧异——从梅光迪、胡适往来书信看“胡梅之争” 罗惠缙; 周彩云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5-15
- 158.论胡适的“白话”观 钱雯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2007-07-20
- 159.胡适的“完全教育”思想——兼析胡适教育观的跨世纪前瞻性 张春泉 湖南社会科学 2007-07-28
- 160.余英时的胡适观 李正春 鲁迅研究月刊 2007-08-20
- 161.补阙两则 朱正 鲁迅研究月刊 2007-08-20
- 162.且当一部《论语》看 林谷 书屋 2007-09-06
- 163.高宗武华盛顿隐居遗事(三)——应胡适之请作《关于对日宣传事项》 夏侯

叙五 书屋 2007-09-06

- 164.胡适史料拾遗续编(下) 吴元康 历史档案 2007-08-15
- 165.山中兰花草 王振忠 书城 2007-08-05
- 166.胡适与齐白石 苏育生 书屋 2007-09-06
- 167.胡适关于安徽清代学人及文献之佚函二通 吴元康 文献 2007-07-13
- 168.试论胡适“五四”时期对文艺理论建设的贡献 张舸 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 2007-07-15
- 169.民国时期的词体观念 彭玉平 文学遗产 2007-09-15
- 170.章门弟子与“古史辨派” 卢毅 史学史研究 2007-09-15
- 171.胡适与国民政府 郎学初 船山学刊 2007-07-25
- 172.胡适宪政思想研究综述 陈少阳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07-06-01
- 173.胡适与张君勱的宪政思想比较 张振国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7-09-1
- 174.刘文典与胡适交往的历史考察 周乾 学术界 2007-07-15
- 175.1925:“歧路”上的胡适 邵建 同舟共进 2007-09-01
- 176.1933年鲁迅对胡适的批评 郝庆军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7-15
- 177.杜甫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以胡适、闻一多、冯至为例 孔令环 中州学刊 2007-09-10
- 178.胡适视野中的“易卜生主义” 谯志宏 保山师专学报 2007-07-15
- 179.胡适保存汉字论 赵海红; 张天明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7-25

简 讯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举行成立 20 周年学术座谈会

2009 年 4 月 27 日（农历二〇〇九年四月初三），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成立 20 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北京香山召开。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耿云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学会成立 20 年来，秉持既定宗旨，宏扬五四科学民主的传统，团结学界同人，加强中国现代文化的研究工作，积极促进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为提高全民族的精神素质、推进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耿云志会长还简要回顾了 20 年来学会的主要工作，如组织、举办各种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海内外的学术交流；组织编写多种大型的研究文化及文化史的著作、资料书和工具书，促进相关学科的进步与发展，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好评。耿云志会长并对多年来支持学会的有关领导、老同志表示敬意和谢意；对许多合作单位以及有关媒体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耿云志会长说，在将来的日子里，学会仍将立足于学术开展工作，争取取得更大的成绩。他并希望朋友们要把学会当作我们共同的家园，大家保持联系，经常对学会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建朗先生主持。耿云志会长讲话后，王建朗先生宣读了学会的名誉顾问、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王文元先生的贺词。次由学会下属各分会汇报工作（分别由左玉河代表口述历史研究会、郑峰代表企业文化研究会、宋广波代表胡适研究会次第报告）。

座谈会上，学会顾问丁伟志先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步平先生、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先后致辞。学会的学术委员张椿年、朱成甲、陈漱渝也先后讲话。最后由与会来宾自由发言，先后发言的有梁景和、欧阳哲生、李长莉、徐思彦等。他们一致肯定学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同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建议，表达出殷切的期望。（宋广波）

中国社科院举办五四运动 9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9 年 5 月 3-4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办、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纪念五四运动 9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地区的学者近百人出席了会议。

在 5 月 4 日上午，举行全体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致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作《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新起点》的主题报告。

会议共收录学术论文 56 篇，安排大会报告 1 场，分组讨论 12 场，国学论坛

1 场。在两天的研讨会中，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几十年来的五四运动史研究、五四时期的思潮、五四与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与中国的新文学、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五四的认识与反应、五四时期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整合、五四与现代中国政治势力的重构、五四前后的国际局势与中国人国际秩序观的变化、五四与现代中国外交、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五四时期观念与习俗的转变、五四与中国现代教育、五四与近代宗教、传统与现代间转换的五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与局限、五四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趋向等专题进行广泛地研讨。（黄春生）

《胡适研究论丛》第一辑出版

早在 2005 年，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教授即和国内某出版社达成协议，由该出版社出版由本会编辑的《胡适研究论丛》，并于 2006 年将书稿交出版社。但由于种种原因，书稿一直未能付梓。2008 年冬，本会改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接洽，并得该社支持，同意出版该书。最近，《胡适研究论丛》第一辑终于面世了。我们对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给予胡适研究事业的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胡适研究论丛》第一辑《目录》如下：

前言	耿云志
鲁迅与胡适自由观的异同	陈漱渝
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	
——兼论中国近代史上不存在“全盘西化思潮”	郑大华
胡适与哥伦比亚大学	欧阳哲生
论胡适在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中的双重角色	张德旺
胡适与基督教的互动	
——以《说儒》借用基督教的观念为例	林正三
胡适思想和徽商文化	方利山
“狂徒”亦有谦逊时	
——刘文典教授敬佩胡适之	黄艾仁
试析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分化	
——以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三人关系为中心	卢毅
从一封佚信看胡适对苏俄的认识	智效民
胡适的词学思想与《词选》	刘石
白话文运动中的“文学”	
——以胡适为中心的考察	季剑青

“学衡派”与胡适诗歌理论异同论	钟军红
试论胡适与中国现代标点符号体系	翟 迅
胡适语文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赵海红
胡适藏书题记选介	邹新明
回忆胡适先生	[日]入矢义高
入矢义高致胡适的十封书简	石立善整理
《学术之于政治的现代诠释》序	耿云志
“《胡适文存》精读”课程教学大纲	朱文华
胡适的《日记》	宋广波
胡适研究论文目录索引（1998—2006）	宋广波辑
戏剧的政治含义：胡适的早期政治哲学解读	靳 松
胡适文学革命的“语言”逻辑	郭小英
张元济和胡适	谢 慧

《胡适研究通讯》征稿启事

为了推动胡适研究，保持和加强胡适研究会会员和关心胡适研究活动的朋友之间的联系，胡适研究会将于 2008 年开始，刊印《胡适研究通讯》。

《胡适研究通讯》的内容主要是：汇录海内外胡适研究的各种信息；刊登胡适研究短论、书评；刊登胡适的未刊文献；登载重要著作、文章的内容摘要；报道胡适研究会的工作等等。热诚欢迎胡适研究会会员和海内外热心胡学的朋友们踊跃赐稿。

《胡适研究通讯》每年编印四期，每期 3—5 万字，将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即每年的 2、5、8、11 月）印行。

《胡适研究通讯》为仅供学会会员阅看的非卖品，系内部印刷物，不公开出版、发行。每期印制 200 份左右。

因我们财力有限，因而凡被《胡适研究通讯》采用的稿件，一律不付稿酬。但作者可将其文稿再投给其他报刊。

《胡适研究通讯》由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先生负完全责任，由宋广波负责征稿、编辑、印制及邮寄等事宜。

《胡适研究通讯》是专门为有兴趣做胡适研究的朋友们创办的一个学术园地。我们相信这是大家所共同期盼的，能够得到大家的爱护和支持。

联系人：宋广波

通讯方式：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宋广波收（邮编 100006）

电子信箱：hushi911217@126.com

胡适研究会 2007.11.24

本《通讯》承蒙中研院近史所胡适纪念馆以及陈宏正先生予以资助，在此一并致谢。